



12/20 盖有印 二七 封面作者：胡杰 2015 胡杰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 《记忆》第 140 期

# 目 录

## 【专 稿】

吴 迪 乌托邦实验：毛泽东的“新人新世界”

## 【要有光】

胡 杰 为了孩子，饿死也不肯倒下的妈妈（版画）

依 娃 陇西逃荒人王兰芳访谈

## 【札 记】

胡庄子 毛泽东、萧军与王实味

## 【述 往】

王丕忠 镇反纪实（一）——缘起

马昌海 追忆三线“五·七”厂（二）

## 【序与跋】

启 之 “思痛”之华——《云南文革笔记》读后

## 【书讯】

韦 陀 周孜仁著《云南文革笔记》在台出版

## 【资 料】

1. 1967年1月10日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全体革命职工向毛主席致敬电

2. 1967年1月13日上海和外地在沪各革命造反团体欢庆中央贺电，

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 【读者来信】

1. 漂木谈章铎文 2. 吴越谈《记忆》首发 3. 范世涛答吴越来信 4. 谢定国正误

## 【版权声明】

【专稿】

## 乌托邦实验：毛泽东的“新人新世界”

吴迪

近代史上，大凡极权政体的创始人都具有创造新人新世界的浪漫激情：洪秀全要在太平天国中实现“十新”，<sup>1</sup> 墨索里尼要在意大利“重新塑造人”，<sup>2</sup> 列宁为星期六义务劳动叫好，呼唤“新人”的诞生，<sup>3</sup> 斯大林则把苏联建成了一个“新世界”——第一个以社会主义为旗号的极权国家。但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他们都无法与毛泽东相比。从青年时代开始，毛泽东就立志要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sup>4</sup> 就醉心于“新村”计划。<sup>5</sup> 为了这一理想，他以改造人性为毕生事业，不惜一切代价描绘出一幅又一幅“最新最美的图画”；为了这一理想，他以 73 岁的高龄毅然发动文化大革命，毫不留情地砸烂了他亲手缔造的红色政权。

思想史家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之一是“追求新人新世界”，<sup>6</sup> 文革史家认为，“五·七指示”是建设新世界的纲领，是打开文革之谜的一把钥匙，其实质是空想。<sup>7</sup> 这

---

<sup>1</sup> “十新”是洪秀全为宣传太平天国而编写的一首诗，全诗是：“上帝基督住人间，天地新；爷哥带朕幼作主，朝廷新；父子公孙同作主，天国新；爷妈哥嫂同下凡，天堂新；太平天日照万方，世界新；天将天兵齐辅佐，爵职新；在地如天圣旨行，山海新；蛇兽伏诛人安妥，臣民新；一统万年万万年；景瑞新，风调雨顺天恩广，万象新。”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 54 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年。

<sup>2</sup> 杜美谈到，西方学界对极权主义的认识包括六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一种类似革命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它确定极权统治的目的并为此而申辩，这个目的是完全的、激进的且是永久性的革命的对国家和社会的改造，直至创造‘一种新人’，直至达到一种和平的终极状态（乌托邦式）。”墨索里尼在这方面有过明确而坚定的思想。他认为：“法西斯主义不只是法律的赋予者和机构组织的创立者，而且是精神生活的教育者和促进者。它不愿重新创造人们生活的各种形式，而要重新创造其内容，重新塑造人，塑造性格，塑造信仰。”见杜美：《欧洲法西斯史》第 28 页及第 19—20 页，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 年。

<sup>3</sup> 列宁《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列宁全集》第 28 卷，第 403 页。

<sup>4</sup> 毛泽东：《与黎锦熙书》，1917 年 8 月 23 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第 26 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

<sup>5</sup> 毛泽东：《与黎锦熙书》，1917 年 8 月 23 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第 53 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

<sup>6</sup> 李泽厚：《现代思想史论》第 192 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 年。

<sup>7</sup>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 2—6 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一空想是从 1958 年的“三面红旗”开始的。<sup>1</sup> 党史专家指出，毛的“新村”计划与新人新世界有异曲同工之妙。<sup>2</sup> 从这些论断中可以得出这样两个结论：一，毛的这一“追求”贯穿了他的一生；二，毛早在文革前就开始了新人新世界的实验。随之产生的问题是，毛泽东追求新人新世界的基础何在？他为这一追求创造了哪些必要的条件和方法？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将重点分析延安整风、雷锋思想、新民主主义论、合作化运动和“五·七指示”，以探讨毛泽东锻炼新人的方法，毛式新人的特点，以及毛进行这一实验的政治基础和经济模式。在探讨这些问题之前，有必要对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思想做一介绍并略加分析。

## 一、思想道德：宇宙之“大本大源”

1917 年，青年毛泽东有了一个巨大的发现——宇宙的大本大源存在于哲学和伦理学之中：“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暝皆开，则沛乎不可御也。”<sup>3</sup> 他所说的哲学，指的是思想，他所说的伦理学，指的是道德。“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盖二者之势力，无在不为所弥漫也。”<sup>4</sup> 只有改变全国人民的思想道德，才能改变“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的现状，才是中国的根本出路。从此，改造人，创造一代新人成为毛泽东终生追求的伟大事业。

改造人的前提是洞察人性，青年毛泽东对人性有独特的领悟：“人者，动物也，则动尚矣。……动以营生也，此浅言之也；动以卫国也，此大言之也；皆非本义。动也者，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愚拙之见，天地盖惟动而已。”<sup>5</sup> 动是人的本性，更是豪

---

<sup>1</sup>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 11 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年。

<sup>2</sup> 萧延中：《晚年毛泽东》第 178 页，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 年。

<sup>3</sup> 毛泽东：《与黎锦熙书》，1917 年 8 月 23 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会 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第 86 页，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年。

<sup>4</sup> 同上。

<sup>5</sup> 毛泽东：《体育之研究》，1917 年 4 月 1 日，《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第 69 页。

杰之士的“人格之源”。但人之动，并不是被客体推动的被动之动，而是主体对客体主动的挑战和斗争。“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障碍则无幸福”是“至真之理，至彻之言。”<sup>1</sup> 这种斗争将随着客体的阻碍、束缚而增加，而强大。所以，他转而讴歌客体给主体带来的困难：“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盖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之隔，而风力盖增其怒号。”<sup>2</sup> 青年毛泽东把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看做人生至乐，盖源于此。

高扬主体的人格力量，也就是崇尚主体的道德精神。在青年毛泽东看来，道德来自于主体自身，而非客体的强制：“道德非必待人而有，待人而有者客观之道德律；独立所有者主观之道德律也。吾人欲自尽其性，自完其心，自有最可宝贵之道德律。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我眼一闭，固不见物也，故客观之道德律亦系主观之道德律。”<sup>3</sup> 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道德观强调的显然是主体的道德自觉。

从道德自觉出发，自然会得出人性本善的结论：“故吾谓天下无恶，有之则惟次善；天下无恶人，有之则惟次善人也。”<sup>4</sup> 怀抱着这种理念，青年毛泽东有理由相信，不但自己可以成为圣贤，而且“彼时天下皆为圣贤。”<sup>5</sup> 看来，“六亿神州尽舜尧”，“遍地英雄下夕烟”，并不是一时的诗兴。

思想史家将毛泽东的上述观念概括为“动、斗的宇宙—人生观”和“贵我的道德律”，<sup>6</sup> 它们构成了毛泽东改造人的思想基础和心理动力。而他的心目中的新人标准，也由此看出端倪：第一，在思想上，新人应该去旧更新；第二，在道德上，新人应该有新道德；第三，在人格上，新人应该具有主动性、斗争性，并且能够自觉自愿地改造自己。

在决心变换全国之思想的同时，毛与他的同志们开始了新世界的试验——1918年6月，他与蔡和森、张昆弟等人在岳麓山下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工半读，打算建立一个人

---

<sup>1</sup> 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批语，《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第182页。

<sup>2</sup> 同上，第180—181页。

<sup>3</sup> 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批语，《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第148页。

<sup>4</sup> 同上，第250页。

<sup>5</sup> 毛泽东：《与黎锦熙书》，1917年8月23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第2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sup>6</sup> 李泽厚：《青年毛泽东》《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122—134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年。

人平等的新村。1920年4月7日毛到北京专程拜访译介日本新村运动的周作人，回湘后，他草拟了一个详尽而周密的新村建设计划。《毛泽东传》的作者告诉我们：“毛泽东是这样来设计他的理想社会的：创造新学校，实行新教育，让学生们在农村半工半读；再由这些新学生，创造新家庭，把若干个新家庭合在一起，就可创造一种新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设立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厂，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等等；以后，把这些一个个的新社会连成一片，国家便可以逐渐地从根本上改造成一个大的理想的新村。他在文章里写道：‘今不敢言模范国、模范都、模范地方，若模范村则诚陈义不高，简而易行者。’”<sup>1</sup>

虽然毛泽东并没有论及这个“陈义不高”的“模范村”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但是，在它的无政府主义外衣下，我们可以看出：第一，这个新社会奉行的是全能主义的政治体制。否则，到农村参加体力劳动，实行半工半读等措施就无法实现。第二，这个新社会在经济上实行公有制，实行按需分配，没有商品交换，没有私有财产。因此，这是一个财产平均，人人平等的社会。第三，这个新社会的文化应该与其政治、经济构成一个整体，其基础在于新学校和新教育。这里的新学校、新教育必须是一元的而不是多元的，否则它们就培养不出在思想、道德、风尚、习惯等方面高度一致的新人。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新社会不在城市，而在农村，它是一个封闭的，与外部世界隔绝的社会。

但是，揆之以计划者的哲学，这个新社会显然存在一个内在的、无法解决的矛盾——毛泽东推崇的“动、斗”理念与他的追求的新村理想势同水火。既然运动、对立、冲突、斗争是永恒的宇宙规律，那么，这个“陈义不高”的新社会怎么能够平静安稳地长存于世呢？既然主体对客体的抗争是人之本性，那么，在这里生活的新人们怎么能丧失本性，而安于新村的现状呢？当年此文在《湖南教育月刊》上公诸于世的时候，毛并没有想到这一点——紧迫的国内形势逼迫着他直面现实。他要走出湖南，走向全国，去革命，去造反，搞武装割据，夺取政权。他的新人新世界的宏伟理想只能等到掌权之后才能提到日程上来。

---

<sup>1</sup>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第5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至少，他需要一个稳固的根据地，一个高度组织化、一体化的社会环境，一个可以完全由他控制的思想道德改造运动。

## 二、延安整风：新人的第一次锻炼

延安为毛泽东供了这一条件。在这里，他迈出了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的第一步——延安整风。毛泽东开展这一运动有两个目的，其一是摧毁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国际派”的党内基础，肃清他们的俄式马列主义的影响，从而确立自己在党内的最高权威。其二是，用毛式马列主义，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毛泽东思想，彻底改造中共，改造中共党员，从而“构筑以自己思想为核心的中共新传统，并将此注入到党的肌体。”<sup>1</sup>肌体是由细胞组成的，作为细胞的党员干部，有着不同的经历、出身、思想和文化背景。要让自己的思想深入到每一个党员干部的血液之中，就必须触及他们的灵魂；用二十多年后的话讲，就是让每一个党员“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放弃自我，心甘情愿地接受改造。为了完成这一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艰巨工程。毛泽东为这场改造运动制订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把宋明新儒家‘向内里用力’的观念融入共产党党内斗争的理论，交替使用思想感化和暴力震慑的手段，大力培养集忠顺与战斗精神为一体的共产主义‘新人’的理想人格，并在此基础上构筑党的思想和组织建设的基本范式。”<sup>2</sup>

要将基本原则落到实处，就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方法，这个方法应该由浅而深，由表及里，逐步深入人心。高华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一书中对此有过生动而详实的描述——

第一步，要求全党学习包括毛著在内的 22 个文件，以整顿三风（学风、党风、文风）为中心，以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为号召。学习文件又分为三个阶段，（1）粗读文件阶段，要求将上述文件全部浏览一遍，并做笔记，进行初步讨论。（2）精读文

<sup>1</sup>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 304 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 年。

<sup>2</sup>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 305 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 年。

件阶段，要求学习者将所有的文件分类反复精读，达到“眼到”（精细研读）、“心到”（深思熟虑，领会文件的实质精神）、“手到”（写读书笔记）、“口到”（质疑、漫谈、开讨论会）。（3）考试阶段。考试题由毛亲自审阅和修改，出题的原则是，要求学习者用文件内容来对照检查党的作风和自己的工作密切联系起来。

第二步，命令所有的参加者必须写出具有自我批判性质的“反省笔记”，并且建立起抽阅干部反省笔记的制度。这正是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对照圣贤思想反省自己的言行，“吾日三省吾身”、“克己复礼”、“正心诚意”是中国的传统。毛的这一举措，实际上就是将中国哲学中的“内省”、“修身”与列宁主义的“新人”概念融为一体。这一融合既有传统做支撑，又有“与时俱进”的先进性，所以实行起来非但没有受到什么阻碍，反而得到了参加者的积极拥护——王若飞、王思华、曹里怀、吴玉章等党内、军内的高级干部和元老级人物纷纷撰文，反省自己的错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将这些人的反省经验大力推广，“再结合以组织措施落实，对延安干部的心理造成了剧烈的冲击和震荡。……至此，毛泽东设计的思想改造工程的关键性步骤——清算过去的大门已经打开。下一步就是广大党员挑选适合自己的政治标签，对号入座，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依照报上发表的反省样本，如法炮制各自的反省检查。”<sup>1</sup> 这种制度至少有两大好处，（1）可以随时了解全党接受自己新概念的程度，以因势利导。（2）在反省笔记中寻找异端，选出典型打击之，以警戒全党。学习文件、写反省笔记是“思想感化”，选出典型进行打击则是“暴力震慑”。

第三步，肃清“极端危害党的大患”——“小广播”。所谓“小广播”是相对宣传党的思想政策的“大广播”而言的，“小广播”私下谈论党的政策和人事关系，重视个人友谊、讲究人情私交，完全属于毛泽东所说的“自由主义”。在反对自由主义的口号下，负责整风的中央总学委开列了“小广播”的五种表现，要求各部门严密注意“三种人”——在思想和组织上存在浓厚的自由主义、厌恶党的原则、组织纪律和秘密工作制度者；讲温情私交，讲友谊，不分敌我者；喜欢溜门子，打听别人的生活起居，加以评头论足者。总

---

<sup>1</sup>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406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



学委要求“每个党员深刻的反省自己与严正的批评别人，检查自己和别人是否犯了小广播的错误，曾洩露了一些什么秘密，向外广播了一些什么消息，向党隐瞒了一些什么问题，听到了一些什么不利于党的消息没有向党报告，对于这些问题每个党员应向党诚恳坦白的报告出来。”<sup>1</sup> 为了便于坦白，总学委要求每个党员填写“小广播调查表”。反省笔记交待的是个人的思想认识，“小广播表”则强迫人们交待自己的私生活。这种对于基本人权和个人隐私的公开干涉和侵犯，实际上等于宣布个人感情和私人交往为非法。这既反映了毛思想改造野蛮强制的一面，也表明了毛心目中的新人标准。

第四步，发动坦白运动，指令党员和干部以书面的形式详细交待个人历史。交待个人历史主要有两种形式，（1）填写干部履历表，（2）书写详细的个人自传。毛泽东对后者更加重视，提出个人自传“可三番五次地写，以写好为度。”毛之所以提出这个要求，是为了给干部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以彻底摧毁党员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所谓‘写好为度’，其实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无非是要求个人交待得更细致、更广泛、更深入。问题的要害是干部在‘三番五次’写自传的过程中，必然进一步否定自我，而对党的领袖和各级领导愈加敬畏。”<sup>2</sup>这正是毛泽东从思想道德上改造人的战略性步骤——向党交心，写个人自传的过程就是党员自我意识日益消失，个体透明度日益提高的过程，也就是旧人向新人的蜕变、“升华”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毛作为党员良知和共产党道德判断的最高存在，已在党员的精神世界中牢牢占据主宰地位。”<sup>3</sup>“干部交待个人历史，终于成了锤炼新人的铁砧。”<sup>4</sup>

需要补充的是，以上的“四步曲”展示的仅仅是延安整风“和风细雨”的一面，其“急风暴雨”的一面——审干、肃奸，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目标不断变化而日益凸显，最后成了改造人这一工程之外的重大收获。在揪出王实味之后，毛要求各部门进一步扩大战果：“我们要发现坏蛋，拯救好人，要发现坏人，即托派、国特、日特三种坏人。……各

---

<sup>1</sup> 同上，第 408 页。

<sup>2</sup> 同上，第 422—423 页。

<sup>3</sup>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 421 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 年。

<sup>4</sup> 同上，第 423 页。

机关都要冷静观察，此项工作应有计划的布置。”<sup>1</sup> 根据这一精神，审干肃奸的狂飚横扫这个陕北小城。高岗负责的西北局竟将党员总数的 10%划为清洗之列。显而易见，“急风暴雨”和“和风细雨”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前者，思想改造就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没有后者，前者就会失去合理性、正义性和群众基础。

近三年的整风，新人终于锻炼出炉。谢觉哉有一首七言诗形象地描述了旧人脱胎换骨变成新人的过程：“紧火煮来慢火蒸，煮蒸都要工夫深。不要捏着避火诀，学孙悟空上蒸笼。西餐牛排也不好，外面焦了内夹生。煮是暂兮蒸要久，纯青炉火十二分。”<sup>2</sup> 经过这番紧煮慢蒸而产生的新人具有了如下特点：他们成了毛的信徒，“学会了用毛的思想观察世界和指导个人的言行。表现在行动上，则是彻底抛弃资产阶级人性论和温情主义。非党性勿言，非党性勿听，非党性勿动，绝对服从领袖、组织、上级的命令和指示。”<sup>3</sup> 毛泽东在改造人，在实现新人理想的万里长征上迈出了第一步，以后还有第二步，第三步，……直至他离开这个世界。

### 三、新人的榜样：从雷锋到红卫兵

据戴晴统计，1957 年的反右运动是建国以来的第 12 场政治运动。<sup>4</sup> 反右之后到文革之间发动了多少政治运动，似乎还没有人做过统计。除了打击想象中的政治对手之外，毛泽东发动这些政治运动的基本目的就是改造人，改造人们的思想道德，以达到“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理想境界。尽管延安整风为毛泽东提供了进行这种思想改造的基本范式，但是，他清楚地知道，延安整风仅限于党内，其锻炼出来的“新人”也只限在党员和干部之中。要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将全国人民都变成新人，除了延安经验之外，还需要树立足以令人们敬服的道德楷模。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以点带面，通过学习英雄模范，庶

---

<sup>1</sup> 同上，第 415 页。

<sup>2</sup> 谢觉哉：《一得书》，第 85—86 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年。

<sup>3</sup>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 436 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 年。

<sup>4</sup> 戴晴：《毛泽东在 1957》，载《东方纪事》1989 第 1 期。

几可以使思想改造蔚然成风，推向全国。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做过这种尝试。他曾专门为两个人——白求恩和张思德——写过文章，号召人们向他们学习。毛泽东之所以把这两个人树为榜样，是因为他们都具备了“大公无私”的美德。这种品质对当时的现实政治固然有用，但是，真正使毛感兴趣的并不是眼前的功利，而是长远的理想——显而易见，他的新人需要这种品质，在新世界中生活的人们应该具备这种美德。在毛看来，一个人，只有具备“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才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sup>1</sup>也就是说，“无私”是新人的必备条件，是创造新人的前提，是改造人的基础。这两篇文章后来被列入“老三篇”，成为干部战士的“座右铭”，全国人民的必读书，原因就在这里。

大公无私是必要的，但是光有大公无私还不够。个人道德的完善仅仅是新人的基础，基础之上还应有更重要的、更能统一“全国之思想”的“上层建筑”。新政权建立之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毛泽东的新人标准也在“与时俱进”——他选中了雷锋。在中共夺取天下的历史中，出现过许多英雄——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sup>2</sup>在新政权的建设事业中，涌现过许多模范——王国藩、焦裕禄、王进喜……。毛泽东之所以选中雷锋，是因为这个普通一兵大大超越了白求恩和张思德；他身上不但有其所有，而且还有其所无。

这些所无的东西，在《雷锋日记》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示。<sup>3</sup>首先，《日记》充满了对党和领袖的无限感激、崇拜与忠诚。“伟大的党啊，英明的毛主席，有了您，才有了我的新生命。……在您的不断培养和教育下，使我从一个孤苦伶仃的穷孩子，成长为一个有一定知识和觉悟的共产党员。”“伟大的党啊，您是我慈祥的母亲！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您的，我要永远听您的话，在您的身下尽忠效力，永远做您忠实的儿子。”（1960/11/8）“中国共产党把我哺育大的，要是没有党和毛主席，就没有我的一切。……”（1960/11/27）

<sup>1</sup> 《毛泽东选集》，第620—6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

<sup>2</sup> 王力雄在《毛泽东主义与人间天堂》一文中最早提出了这一观点，见《华夏文摘》增刊第262期，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C主办，2001年6月10日出版。

<sup>3</sup> 《雷锋日记》（1958—1962），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63年。

“我要时刻准备着为党和阶级的最高利益，牺牲个人的一切，直至生命。”（1960/12/27）

“自从来了伟大的共产党和英明的毛主席，我才脱离苦海见青天。伟大的党啊——我慈祥的母亲，是您把我从虎口中拯救出来，抚育我成长。是您，给了我无产阶级的思想。是您，给我指出了前进的方向。是您，给了我前进的动力。是您，给我的一切……。”（1962/2/14）

类似的表白，在日记中比比皆是。可以说，《雷锋日记》是一封对共产党的感恩信，对毛泽东的效忠书。感恩与效忠是贯穿日记的永恒主题，是“雷锋精神”的心理基础。值得注意的是，这里面一片赤诚，绝无半点虚伪、造作和功利主义。

其次，《日记》洋溢着“甘做革命的螺丝钉”的绝对服从精神。《日记》中有一句格言：“一个人的作用，对于革命事业来说，就如一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螺丝钉虽小，其作用是不可估量的。……我要不断地加强学习，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坚决听党和毛的话，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随时清除思想上的毛病，在伟大的革命事业中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1962/4/17）列宁把文艺比做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雷锋把个体，把人当做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这种甘当螺丝钉的绝对服从精神在毛泽东提出向雷锋同志学习之后，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它不但形成了一时的社会风尚，而且塑造了一种人格。

第三，《日记》的主人发誓自觉自愿地改造自己。螺丝钉而永不生锈，就要不断地自觉地改造自己。雷锋改造自己的方法就是学习毛著——“打仗没有武器不行，开汽车没有方向盘不成，干革命没有毛主席著作不行。”（1961/4/12）《雷锋日记》中相当一部分篇幅是学习毛著的心得体会。其特异之处在于，他将学与用紧密结合，毛主席的教导被他融化到血液中，贯彻到行动里。在短暂的一生中，雷锋做了大量的好事，以至于在人们的心目中，雷锋成了助人为乐的符号。

毛泽东之所以要表彰雷锋，《雷锋日记》就是答案。雷锋不但把“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发挥得更彻底更坚定，以至于发誓“甘做革命的傻子”（1960/8/20），“把有限的生命投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1961/10/22），更重要的是，他不用“紧蒸慢煮”，就能够做到“非党性勿言，非党性勿听，非党性勿动，绝对服从领袖、组织、上级

的命令和指示。”延安整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到的成果，这个普通士兵仅仅凭着自觉的自我改造就做到了。

毛泽东为雷锋题词是在 1963 年。五年前，毛泽东向新世界的第一次冲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纷纷落地，国民经济全面衰退，国内党内的不满情绪滋长，毛泽东的威信下降。而国际上，赫鲁晓夫揭了斯大林的老底，大搞毛泽东所谓的“修正主义”。面对着国内外的变化，毛泽东迅速地得出了“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结论。在毛看来，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不但关系到他个人的荣辱，而且意味着他终身为之奋斗的事业——新人新世界的理想落空。要坚持这一理想，在重振个人权威的同时，还要重新审定他的新人标准。白求恩、张思德身上的道德主义固不可少，却无助于重振威权，无助于反修防修，无助于阶级斗争。雷锋的价值在于，他的出现为毛提供了社会主义时期的新人标准——真诚的感恩与无限的效忠，螺丝钉般的服从与可靠，如饥似渴地学习自己的著作，完全彻底地按照自己的指示行动与思考。如果六亿国人都像雷锋一样，那末修正主义还能得逞吗？阶级斗争还能熄灭吗？新世界还会遥遥无期吗？

在毛的号召下，全国掀起了学习雷锋，加强思想革命化的运动，写日记、学毛著，做好人好事成为社会风尚。毛泽东的改造人，改造人性的计划更上一层楼。

遗憾的是，雷锋身上缺乏一种毛式新人最重要的品质——斗争精神。斗争精神，就社会层面而言，就是反抗现存秩序；就人性层面而言，就是不断地发展自我本性。“豪杰之士发展其所于天之本性，伸张其本性中至伟至大之力，因以成其为豪杰焉。本性以外的一切外铄之事，如制裁、束缚之类，彼者以其本性中至大之动力排除之。此种之动力，乃至坚至真之实体，为成全其人格之源……。”<sup>1</sup>这是青年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的说的。把动、斗视为宇宙真理之“大本大源”的毛泽东，<sup>2</sup>是不能满足感恩效忠、绝对服从的螺丝钉的；他心目中的新人，要兼备服从与斗争这两种品质。从道德理想上讲，毛的新

---

<sup>1</sup> 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批语，《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第 218 页。

<sup>2</sup> 同上，第 123 页。

人应该是圣贤，但是从人格理想上讲，毛泽东更欣赏的是他早年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赞美的“革命先锋”。

所以，在为雷锋题词前后，毛泽东一方面要求全国人民都要学习解放军，强化国人的组织纪律性；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求“在这个不断地教育人的运动中……，把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sup>1</sup>与此同时，不断地发表内部讲话，赞成学生上课睡觉，批评现行的学制、课程和考试方法，鼓励学生自学，造老师、造教育制度的反。<sup>2</sup>1964年7月14日，毛提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sup>3</sup>，在这五条标准中，赫鲁晓夫被点了六次名。可以说，五条标准的每一条都以赫鲁晓夫为反面参照——“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绝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制订接班人的标准，既是政治斗争的需要，也是毛对新人的力量热切企盼——只有敢于斗争，才能反修防修。

这一企盼，在两年后变成更加明确，更加坚定——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刚刚揭开序幕，毛就提出：“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斗争精神与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sup>4</sup>毛之所以把斗争精神与牺牲精神作为革命先锋队的首要条件，是因为，这个先锋队不但是摧毁旧世界的勇士，而且是创造新世界的前驱。

两个月以后，毛泽东呼唤的革命先锋队——红卫兵横空出世。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三

---

<sup>1</sup> 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1964年7月14日，《学习资料》第119页。

<sup>2</sup> 毛泽东：《春节对青年的指示》，1964年2月；《同毛远新同志的第一次谈话》，1964年2月；《关于学校课程和讲授、考试方法问题的批示》，1964年3月10日。见《学习材料》第99页，100页，101—102页。

<sup>3</sup> 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条件》，1964年7月14日，《学习材料》第122—123页。

<sup>4</sup> 毛泽东：《要造就一大批这样的人》，1966年7月13日，《学习材料》第233页。

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使毛泽东看到了两个“不谋而合”——

第一，它将雷锋的忠诚、服从与新世界前驱的斗争精神、牺牲精神完美无缺地融为一体——“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是说，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sup>1</sup>“我们这些造反之众，有领导、有武器、有组织、有‘野心’，来头不小，切不可等闲视之。我们的领导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我们的武器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我们的组织是彻底革命的红卫兵！我们的‘野心’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sup>2</sup>“我们，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无限忠于毛主席，一定最坚决，一定最勇敢，最忠实地执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关于造反的最高指示。”<sup>3</sup>

第二，红卫兵的造反目与毛建立新世界的“破、立”理论别无二致：“革命者就是孙猴子，金箍棒厉害得很，神通广大得很，法力无边得很，这不是别的，正是战无不胜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就是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sup>4</sup>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给这些红卫兵们写了信，在420余字的回信中，毛用了三个“热烈的支持”。<sup>5</sup>毛对红卫兵的支持不仅仅出于政治需要，更打动他的是红卫兵的道德修养（忠诚与服从）与人格力量（斗争与造反）。他发现，这两种“对立”的品质，完美地“统一”在高喊着“永远忠于”、“誓死捍卫”和“造反有理”的红卫兵身上。

按照毛的设想，新世界仍有阶级斗争，资产阶级思想仍会随时产生出来，“兴无灭资”，“批判资产阶级”<sup>6</sup>一类的任务必须由新人来完成。

---

<sup>1</sup>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红旗》1966年第11期。

<sup>2</sup>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红旗》1966年第11期。

<sup>3</sup>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红旗》1966年第11期。

<sup>4</sup>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红旗》1966年第11期。

<sup>5</sup> 王年一选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第62页，北京：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教研室，1988年。

<sup>6</sup> 这是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一再强调的内容。

就在毛泽东给红卫兵回信的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的社论。毛泽东为新世界绘制的最后的“蓝图”——“五·七指示”昭喻世人。社论告诉人们，这所大学校“可以培养出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全面发展的亿万共产主义新人。”

#### 四、新民主主义论：新世界的政治基础

《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 1940 年写成并发表的，它是前一段时间毛泽东对国内外形势及中共的任务的总结和发展，<sup>1</sup> 也是后来的《论联合政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思想基础。《新民主主义论》的基本观点是，自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进入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经太平天国、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变、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以及抗日战争，所有这些，都是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而斗争。十月革命之后，社会主义国家出现，改变了世界的格局，中国革命就成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由于资产阶级先天的软弱性，中国革命就只能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因为中国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所以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改变这种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按毛泽东的说法，第一步建立的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既不同于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不同于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它只能走第三条道路——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其国体是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其政体是民主集中制，其经济思想是“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其经济结构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国营，“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一部分是私营，“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其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是“民

---

<sup>1</sup> 1937 年 5 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就提到了“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造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



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毛泽东提醒人们，“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地长，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为此，他还批驳了“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是“纯主观”，是“空想”。

这幅诱人的图景迷惑了许许多多的善良的人们，<sup>1</sup>它与毛青年时代的“新村”计划，晚年的“新人新世界”理想似乎毫不沾边。迄今为止，还有不少人认为，新民主主义结束得太早了。<sup>2</sup>但是，只要略加分析就不难看出，在这幅图景之中潜伏着成就新世界的基因——它不过是一座通向新世界的、尚未竣工的桥梁。

第一，毛所说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的国体，其实不过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形式，新世界所必需的全能主义已经隐藏其中。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毛把“各革命阶级”分成了三个等级——无产阶级（中共）是老大，农民阶级是老二，知识分子与其他小资产阶级叨陪末座。在这个等级序列里，无产阶级是不容置疑的领导力量，其他各阶级只有无条件地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加入联合专政的行列。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的论断，是上述等级序列的理论基础。<sup>3</sup>五十年来的历史证明，列宁的立论完全是一个虚假的命题——资本主义不但渡过了危机，而且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相反，倒是宣判人家没落、腐朽、垂死的政党、国家，解体的解体，易帜的易帜，剩下的几个坚持者，也不得不“挂羊头卖狗肉”——以社会主义之名，行资本主义之实。而解体、易帜的原因，即使中国的主流话语，也不得不承认与一党独裁有关。<sup>4</sup>

第二，毛所说的民主制中集的政体，其实不过是一党独裁的代名词。它是全能主义的组织原则，是毛式新世界的权力基础。民主集中制是中共从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学来的，毛

---

<sup>1</sup> 李慎之在《革命压倒民主——〈历史的先声〉（港版）序》一文中谈到，像他一样，许多进步青年，对毛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思想除了“拥护”、“宾服”之外，没有任何自己的看法。见《当代中国研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2001年第4期，第109—110页。

<sup>2</sup> 黎澍认为，“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共产党领导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在各种条件具备的时候，再向社会主义过渡。……可是实际上我们并没有经过新民主主义阶段。”“这个意见在理论务虚会上概括谈过，主要是说新民主主义结束得太早了。于光远后来谈到，那时黎澍的话真是语惊四座，也引起某些权威的不满。然而今天已经是人们的共识了。”见丁守和：《科学是为真理而斗争的事业——忆黎澍的学术生涯》一文，载《黎澍十年祭》第131—13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sup>3</sup>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引用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中的话：“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并且多次提到：“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

<sup>4</sup> 见江流、陈之骅主编：《苏联演变的历史思考》第四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把中共党内的组织原则搬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体之中。所谓的民主集中制，就是毛所说的“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王若水对此有过精辟的分析：“这里，所谓的‘民主’只是让群众发表一些意见而已，而且意见的发表也得在党的指导控制下进行；至于对群众的意见采纳与否，采纳哪种意见，则是党的权力；群众有先进与落后之分，他们的意见也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必须由党来选择判别并作出决定，这就是所谓的‘集中’（‘从群众中来’）；然后，党要教育群众，把党的意见，‘化为群众的意见’，用党的决定来统一思想，这就是‘指导’（‘到群众中去’）”。“按照这个‘民主集中制’，党总是正确的，永远比群众高明。如果把这种党居高临下地倾听下面的意见的形式称为‘民主’，它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家长制的‘开明’而已；古代皇帝也能作到，甚至做得更好，唐太宗不是能‘从谏如流’吗？古代君主制与‘民主集中制’的区别不过在于，前者是君主让大臣发表意见，后者是‘党主’让群众发表意见。在‘民主集中制’下，群众中自然会有人懂得看党的眼色讲话，争取当‘积极分子’；他们的意见也会被采纳，而在形式上还好像是党接受了‘群众的要求’。在‘民主集中制’里没有制约党的机制，党如果做出了错误的决定或其决定并不符合群众的意愿，也照样会得到贯彻执行；而群众中的不同意见则因为受到强大的压力而难以表达，如此党的错误就很难纠正。……在‘民主集中制’下，形式上看是有‘群众运动’，实质上这只不过是‘运动群众’；用这种方法，‘民意’是可以‘制造’出来的（毛本人就说过‘造舆论’），并形成一种声势。”<sup>1</sup>李慎之则以自己的切身经验警示人们：“‘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多么辩证！好像比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更加合理，也比孙中山主张的‘人民有权，政府有能’更为简洁，可怜从来没有过民主经验的中国人，只要在文字上掉一个枪花，就连专制与民主都分不出来了。只有后来尝够了几十年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的人才悟到，它实际上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民主可言，于是才认识到康生所说的‘民主集中制，集中是主要的，民主不过是一个形

---

<sup>1</sup> 王若水：《整风压倒启蒙：“五四精神”和“党文化”的碰撞》，《当代中国研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2001 年第 4 期，第 145 页。

容词而已’，乃是大实话。”<sup>1</sup>

第三，毛曲解、拔高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主体是农民，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农民属小生产者，是落后的阶级，不代表新的生产力。农民革命的根本要求是“耕者有其田”。毛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说的“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并不是农民的目标，而是市民阶级的要求。把农民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混为一谈，这是根本错误的。”<sup>2</sup>毛所说的太平天国，只是“旧式农民战争的尾声”，<sup>3</sup>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缘，“就连中共领导的苏区土地革命也不能算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改革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和历史上历次农民运动的要求并没有什么区别。”<sup>4</sup>“在中国的现代革命中，农民并没有离开自己的传统立场，更谈不上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相反，是‘无产阶级’（共产党）转入了农民阶级的队伍，站到了农民阶级的立场上。”<sup>5</sup>事实证明，这种农民化的无产阶级，既不可能实现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经济政策；更不可能完成孙中山的未竟事业——发展资本主义。<sup>6</sup>它所能实现的只是小农式的原始共产主义，这正是毛式新世界的经济模式。

第四，同理，毛所说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至少一半是空想。农民阶级的本性是保守的、保皇的，因此也是维护封建主义的。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说得很清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

---

<sup>1</sup> 李慎之：《革命压倒民主——〈历史的先声〉序》，《当代中国研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2001 年第 4 期，第 104—105 页。

<sup>2</sup> 王若水：《整风压倒启蒙：“五四精神”和“党文化”的碰撞》，《当代中国研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2001 年第 4 期，第 141 页。

<sup>3</sup> 见黎澎纪念文集编辑组编：《黎澎十年祭》，第 181 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

<sup>4</sup> 王若水：《整风压倒启蒙：“五四精神”和“党文化”的碰撞》，《当代中国研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2001 年第 4 期，第 145 页。

<sup>5</sup> 王若水：《整风压倒启蒙：“五四精神”和“党文化”的碰撞》，《当代中国研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2001 年第 4 期，第 143 页。

<sup>6</sup> 毛泽东把自己当做孙中山的继承人，从 40 年代初就不断强调发展资本主义。他在《论联合政府》中说：“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

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的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依靠“站到了农民阶级的立场上”的所谓无产阶级去领导反封建的文化，无异于与虎谋皮。而毛从正面确立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文化”则完全变了质——“所谓‘科学的’意味着以马列主义教条为标准；‘民族的’意味着排斥西方文化（即‘资产阶级思想’）；‘大众的’就是适应‘工农兵’需要的（贬低精英文化）的。一言而蔽之：党文化。”<sup>1</sup>“党文化”，正是新世界所需要的一元化的文化。

《新民主主义论》的主要思想，先被写进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1949年3月）的决议之中，随后又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49年9月21日）一致通过的《共同纲领》中的重要内容。这个被称为“人民民主的建国纲领”，“新中国的临时大宪章”<sup>2</sup>的《共同纲领》，很快就变成了一堆废纸。四十年后，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指导下，国内的学者们终于大胆指出：“《共同纲领》规定的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各民主阶级的联合专政，而不是什么‘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sup>3</sup>“民主集中制是我国国家政体组织的原则。这表明在我国的政体上本不允许党权高于政权和个人高于集体。”<sup>4</sup>“我们国家的任务是继续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而不是立即开始‘社会主义革命’。”<sup>5</sup>

遗憾的是，这种姗姗来迟的批评仍旧没有触及事情的根本——为什么各民主阶级的联合专政变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在民主集中制可以使党权高于政权，使个人高于集体？为什么毛和他的党可以把民主革命扔到一边，而悍然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决议》提出的理由——中国长期的封建传统，毛泽东个人品质等等是无法说明这些问题的。

事情的真正原因在于，毛泽东一开始就选错了路。如上所述，新民主主义依据的理论违反了历史发展规律，它的政治体制（国体、政体）具有明显的极权性质，它所依靠的基

---

<sup>1</sup> 王若水：《整风压倒启蒙：“五四精神”和“党文化”的碰撞》，《当代中国研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2001 年第 4 期，第 132 页。

<sup>2</sup> 林蕴晖等：《凯歌行进的时期》，第 26 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sup>3</sup> 同上，第 27 页。

<sup>4</sup> 林蕴晖等：《凯歌行进的时期》，第 27 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sup>5</sup> 同上，第 312 页。

本力量使它无法完成既定的经济、文化目标。所以“各民主阶级的联合专政”可以顺利地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毫不犹豫地赶走中共当年信誓旦旦长期坚持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民主集中制”可以毫无愧色地使“党权高于政权”，使“个人高于集体。”对于立志“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的毛泽东来说，错误的选择是最好的基础，革命主体是最强的队伍，极权体制是最大的资本。有了这个基础、队伍和资本，他才好驰骋诗人的想象去构思最新最美的图画。

## 五、合作化运动：新世界的经济模式

最新最美的图画的第一笔是社会主义改造。毛不止一次说过：“1949年那样大的胜利并没有使我高兴，到1955年，当我看到有那么多农民参加了合作社，接着是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我开始高兴了。”<sup>1</sup>国内的某位党史专家解释说，毛之所以在这时候高兴，是“因为1949年的胜利在他的运筹帷幄之中，而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之迅猛，进行之顺利，则为他始料未及。”<sup>2</sup>这种说法说对了一小半——一部分党员干部和群众的盲目冒进对这一高潮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主要的作用并不在下面，而在于决策者。换言之，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是毛泽东掀起来的，它来得迅猛，因为有毛的支持，但是并不顺利，因为阻力重重。

阻力主要来自以刘少奇为首的务实派。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和《共同纲领》的精神，刘少奇执着于节制资本，扶助私营的经济理念，<sup>3</sup>坚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sup>4</sup>他的思想主张可以概括为如下四方面——

---

<sup>1</sup> 这是1958年2月28日和7月22日毛泽东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的讲话，转引自石仲泉：《艰辛的开拓——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萧延中编：《晚年毛泽东》，第130页，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年。

<sup>2</sup> 同上，第130页。

<sup>3</sup> 《共同纲领》第三十条：“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

<sup>4</sup> 1951年3月，在中共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做报告：“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它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最后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斗争。”《刘少奇选集》（1899—1969）下卷 第62页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1951年6月30日，在中共成立30周年庆祝大会上，刘少奇发表讲话：我们必须努力“完成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事业，使中国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在此以后，还要进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载《新华月报》1951年7月号。

第一， 鼓励农民单干， 提倡中农经济， 让少数人先富起来。“最早反映出对富农经济发展表示担心的是东北地区。1950年1月23日，刘少奇在同安子文等人的谈话中，针对当时东北有70%的农户参加了变工互助，党内有许多人对此感到欢欣鼓舞，以为是社会主义积极性的表现，又把三马一犁一车的农民看成是富农的左倾情绪，明确指出，今天东北的变工互助是建筑在破产、贫苦的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这是一个不好的基础。农民参加变工互助之所以能有这么多，就是因为个体经济的破产，农民不得不变工。将来的发展，个体经济都能独立生产，变工互助，势必缩小。这是好现象，证明经济发展了，农民成为中农的更多了，他能够单干了，这是应有的现象。”“应该使这种有三马一犁一车的富裕农户，在几年之后发展到80%，其中有10%的富农。有了这样的基础，将来才好搞集体农庄。”<sup>1</sup>

第二， 批判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冒进思想。“针对山西省委提出，要把互助组提高到合作社，用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的办法逐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制，战胜农民自发因素的意见，刘少奇在多次讲话中指出，有的同志现在就想从实际上来提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山西省委在农村里边提出要组织农业合作社（苏联叫共耕社）；这种合作社也是初步的，10家、8家、30家、20家的农民组织起来，土地、牲畜、农具共同使用。当然这种合作社是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可是单用这一种10家8家组织的农业合作社、互助组的办法，使我们中国的农业直接走到社会主义化是不可能的。因为仅仅依靠农村的条件不能搞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要依靠工业。有了国家工业化，才能供给农民大量的机器，然后实行土地国有化、农业集体化才有可能。以为目前组织合作社就可以改造中国的农业，使个体的小农经济走上社会主义的农业去，那是幻想。”<sup>2</sup>1951年7月3日，刘少奇在给山西省委的报告中加了一个批语：“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

---

<sup>1</sup> 林蕴晖等：《凯歌行进的时期》，第296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sup>2</sup> 林蕴晖等：《凯歌行进的时期》，第296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以过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sup>1</sup>

第三， 保护私人企业，提倡劳动致富。1951年5月13日，刘少奇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民主人士学习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比较进步的近代生产方式，中国只有10%。10%中间，一部分是国营经济，一部分是私营经济。所以中国近代的工厂、私人工厂有进步作用。不管资本家的工厂也好，国营工厂也好，中国的工厂多一点，中国的生产力就会提高，人民的生活就会改善，所以它是进步的生产方式，为人民服务的，还要发展。因此，如果现在就采取社会主义步骤，把工业收起来，对人民没有利益，而且人民也愿意这样搞，如果搞，就要伤害工业生产的积极性。在农村里面，我们曾经宣传过劳动致富，就是劳动发财，农民是喜欢发财的。过去有些地方，因为没收地主的财产，把私有观念动摇了，农民就不大放心。宣传劳动致富，就是为了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总之，伤害私人工业家和个体小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这是破坏作用，是反动的，就是所谓‘左’的错误。因为它破坏生产积极性，妨碍生产力的提高。”<sup>2</sup>

第四， 主张“剥削有理”。刘少奇认为：“现在必须剥削，要欢迎剥削，不剥削就不能生活，剥削是救人，今年关里大批难民到东北去，关外的富农能剥削他，他就会谢天谢地。因此，富农雇人多买了马不要限制他雇人，这不是自流。

---

<sup>1</sup> 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册），第33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

<sup>2</sup> 这是1951年5月13日刘少奇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民主人士学习座谈会上的讲话，转引自林蕴晖等《凯歌行进的时期》，第298页。

将来我们对富农有办法，现在要让他发展，没坏处。”<sup>1</sup>

除了刘少奇，坚持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并将其付诸实施的还有两个人——邓子恢和薄一波。邓子恢当时是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任，<sup>2</sup>1951年9月，在毛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12月下发宣传之后，他发现，这个决议非但没有促进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反而“使小土地出租者不敢出租土地，富农不敢雇长工，有余钱不敢放债，中农不敢发展生产。”<sup>3</sup>于是，他提出了“四大自由”的主张——政府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所有权，允许自由经营，自由处理。提倡劳动互助，但允许单干，允许自由雇工。保证借贷自愿、利息面议的政策长久不变。<sup>4</sup>1952年3月22日，这个四大自由的主张以《关于1952年农业生产十大政策的布告》的形式，以中南局军政委员会的名义晓喻辖区民众。两天后，中南局的机关报《长江日报》就此发表社论，满怀信心地向农民承诺：“这个十大政策是改善农民生活，增强国防力量，昂扬土地改革所业已解放的农村生产力，……巩固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的重要步骤。”<sup>5</sup>

薄一波当时是财经委副主任，财政部部长。1952年底，在他的主持下，财经委和财政部发布通告和施行细则，提出公私纳税一律平等的“新税制”。为了配合新税制，《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样做，一方面照顾了私营企业，另一方面将有利于促使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努力改善经营，推行经济核算制，降低成本，加速资金周转，降低周转费用。”<sup>6</sup>抱着以私营促国营，公私平等纳税思想的薄一波，当然不会对互助合作感兴趣，他与刘少奇一唱一和——一个体农民经过互助合作到集体化的道路，“是一种完全的空想，因为目前的互助组是以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它不能在这样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到集体农场，更不能经由

---

<sup>1</sup> 同上，第296页。

<sup>2</sup> 邓子恢原任第四野战军第二政治委员，司令员是林彪。1949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华中局成立后，任第二书记，华中局于同年12月改称中南局，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3年中央农村工作部成立后，任部长。见王健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及成员名录》，第585页，第605页，第603页，北京：红旗出版社，1983年。

<sup>3</sup> 林蕴晖等：《凯歌行进的时期》，第298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sup>4</sup> 同上，第299页。

<sup>5</sup> 1952年3月24日《长江日报》社论：《农村生产运动的新阶段》。

<sup>6</sup> 1952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社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



这样的道路在全体规模上使农业集体化。”<sup>1</sup>

这些阻力的核心思想是“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这本来是毛泽东的主张，但是，此时毛改变了想法，他要超越新民主主义，否定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而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是“等贵贱、均贫富”，是“组织起来跟党走”走。个体农民祖祖辈辈想的就是发家致富，私营公司老板整天盘算的就是积聚资本，刘少奇等人不去消灭资本主义于萌芽状态，反而鼓吹剥削有理、四大自由，公私平等纳税，这是拉历史车轮倒转，这是右倾保守，这是机会主义。是可忍，孰不可忍？

为了推动合作化，打垮党内反对派，毛泽东双管齐下：一方面自我否定，重订纲领，砍掉新民主主义阶段。另一方面将思想改造与经济跃进相结合，全力掀起社会主义高潮。

1951年9月，毛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中云：“对互助合作运动采取消极态度，看不出这是我党引导广大农民群众从小生产个体经济逐渐走向大规模的使用机器耕种和收割的集体经济所必经的道路，否认现在业已出现的各种农业生产合作社是走向农业社会主义化的过渡，否认它们带有社会主义的因素，这是右倾的错误思想。”<sup>2</sup>“片面地提出‘发家致富’的口号，是错误的。”<sup>3</sup>这无异于指着刘少奇的鼻子逼他承认犯了右倾错误。尽管如此，毛觉得还不过瘾，三个月后，他向全党发出通知，其内容从标题上就可了然——《把农业互助合作当做一件大事去做》。<sup>4</sup>

毛的命令一下，各省争先恐后。1952年上半年，农业部发指示、定比例：“老解放区要在今明两年把农村80—90%的劳动力组织起来，新区要争取三年左右完成这一任务。”<sup>5</sup>与此同时，毛要求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陈伯达，重点研究农业互助合作中的问题。

---

<sup>1</sup> 这是薄一波在《加强党在农村中的政治工作》一文中的话，引自《毛选五卷》第93页。

<sup>2</sup> 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册），第40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

<sup>3</sup> 同上，第43页。

<sup>4</sup> 见《毛选五卷》第59页，编辑者为这篇文章做了如下注释：“这是毛泽东同志为批驳刘少奇反对农业合作化起草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内通知。1951年7月，刘少奇背着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以个人名义写了一封信，肆意指责山西省委关于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报告，并发给各地。刘少奇在批语中，反对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路线，把它污蔑为‘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同年九月，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并在12月15日，为印发决议草案写了这个通知，指示全党把农业互助合作当做一件大事去做。”

<sup>5</sup> 《1952年上半年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发展情况》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农政司发布的文件，转引自林蕴晖等：《凯歌行进

陈伯达迎合上意，把农民的发家致富视为洪水猛兽。1952年8、9月间，中共中央委托中央政策研究室召开全国第二次互助合作会议，该室副主任廖鲁言讲话，强调“与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斗争，仍须加强。”这个讲话的定稿，出于陈伯达之手。<sup>1</sup>是年秋，农村整党，整党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贯彻党的农村政策——不走资本主义道路，走组织起来互助合作的道路。互助合作中的右倾思想成了被批判的重点。

上有所好，下必投之。在盲目冒进、强迫命令之下，互助合作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热潮”，“共产风”、“大锅饭”也随之而来。仅举两例：长治专区新建的千余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中，有76%是将牲口、农具等全部归社会公有，有的甚至连棺木寿材、老羊皮袄也归了社。由此造成思想混乱，生产损失。不少地方一冬无人拾粪，副业生产无人搞，场里、地里庄稼无人收拾，牲口无人喂（甚至有饿瘦、饿死者），有的地方已发生卖牲口、砍树、杀猪、大吃大喝等现象。<sup>2</sup>中南局发现：“（互助合作的）自愿互利政策贯彻不够，残存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还相当严重存在：主要表现为不尊重私人财产权，许多社对牲畜都采取折价入社的办法，实际则长期不付价，等于变相归公，群众说是‘软共产’。”<sup>3</sup>

这是毛在合作化运动中碰到的第一个来自下层的钉子。对于这类钉子，毛采取的是堪称典范的做法——先批评盲目冒进，然后再进行更大的冒进。在此后的陈述中，我们将不断地看到这种做法的反复使用。在批评“共产风”的同时，毛发现，必须从理论上解决问题。“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他从自己掀起的热潮中看到了自我否定的必要性。1953年6月15日，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个被简称为“一化、三改造”（国家工业化，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总路线，成为毛泽东向新人新世界冲锋的第一个里程碑。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毛再一次不点名地批

---

的时期》，第336页。

<sup>1</sup> 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国农业合作化史资料》，第4页 1987年第4期，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

<sup>2</sup> 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册），第150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年。

<sup>3</sup> 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册），第145—146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

判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务实派：“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右倾的表现有这样三句话：‘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哩！比如私营工商业，正在改造，今年下半年要‘立’一种秩序，明年就不‘确’了。农业互助合作也年年在变。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这种提法，看起来可以，过细分析，是不妥当的。‘确保私有财产’。因为中农怕‘冒尖’，怕‘共产’，就有人提出这一口号去安定他们。其实，这是不对的。我们提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比较好，所谓逐步者，共分十五年，一年又有十二个月。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过渡，最后全部过渡完。”<sup>1</sup>

他也没忘记批评提倡“四大自由”的邓子恢和主张“公私纳锐一律平等”的薄一波。邓子恢成了“言不及义，好行小惠”的右倾代表，<sup>2</sup>薄一波成了“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的急先锋。<sup>3</sup>

一切都在变动之中，一切都充满了矛盾和斗争。所以，除了总路线之外，任何事情既不能“确”也不能“立”。即使要确立毛三年前信誓旦旦坚持的新民主主义阶段，也是“停留在原地方”，也是右倾。这不能不让我们联想起青年毛泽东的“动、斗哲学”，信奉“天

---

<sup>1</sup> 毛泽东：《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毛选五卷》，第81—82页。

<sup>2</sup> “言不及义者，言不及社会主义；好行小惠者，好行四大自由之小惠。”见《毛选五卷》，第209页。

<sup>3</sup> 毛泽东：《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见《毛选五卷》，第90—91页。

地盖惟有动而已”，将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视为人生至乐的头脑，岂能容忍事物的稳定平衡，岂有停止制造矛盾和斗争之理？！

确立总路线就是挑起矛盾与斗争的第一个战场。就在这一年的 12 月，毛亲自制订了《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经过这个提纲的权威解释，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而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与七届二中全会决定的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战略相较，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变化。二中全会决议：以实现工业化——发展生产力为中心；总路线：以改变生产关系——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中心。二中全会决议：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再向社会主义转达变；总路线：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砍去了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阶段。”<sup>1</sup>

方向已经指明，道路已经选定，剩下的事就是如何把这个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推向更大的高潮。1953 年 10 月 26 日至 11 月 5 日，中共中央召开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毛在会前和会议期间与农业部负责人进行了两次谈话，要点如下：

一， 为合作社提速。“在新区，无论大中小县，要在今冬明春，经过充分准备，办好一个到两个合作社。……要分派数字，摊派，多了冒进，少了右倾。”“要有控制数字，摊派下去，摊派而不强迫，不是命令主义。”<sup>2</sup>“华北现有六千个合作社，翻一番——摊派，翻两番——商量。合理摊派，控制数字。不然工作时心里无数。东北一番，一番半或两番，华北也是这样。控制数字不必太大，地方可以超过，超额完成，情绪要高。”<sup>3</sup>“做一切工作，必须切合实际，不合实际就错了。切合实际就是要看需要与可能，可能就是包括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和干部条件。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是既需要，又可能，潜在力很大。如果不去发掘，那就是稳步而不前进。脚本是走路的，老是站着不动那就错了。”<sup>4</sup>

---

<sup>1</sup> 林蕴晖等：《凯歌行进的时期》，第 312 页。

<sup>2</sup>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社的两次谈话》，《毛选五卷》，第 116 页。

<sup>3</sup> 同上，第 118 页。

<sup>4</sup> 同上，第 120 页。

二， 多大好省地办社。“办得好，那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sup>1</sup>“发展合作社，也要做到数多、质高、成本低。”<sup>2</sup>为了阻止农民卖地，就要办大合作社。“互助组还不能阻止农民卖地，要合作社，要大合作社才行。大合作社也可使得农民不必出租土地了。……合作社不能搞大的，搞中的；不能搞中的，搞小的；但能搞中的就应当搞中的，能搞大的就应当搞大的，不要看见大的就不高兴。”<sup>3</sup>

三， 用政治绕开法律。“‘确保私有财产’，‘四大自由’，都是有利于富农和富裕中农的。为什么法律上又要写呢？法律是说保护私有财产，无‘确保’字样，现在农民卖地，这不好。法律上不禁止，但我们要做工作，阻止农民卖地。办法就是合作社。”<sup>4</sup>

四， 姓资姓社与谁战胜谁。“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不搞社会主义，那资本主义势必要泛滥起来。”<sup>5</sup>“现在，私有制和社会主义公有制都是合法的，但是私有制要逐步变为不合法。在三亩地上‘确保私有’，搞‘四大自由’，结果就是发展少数富农，走资本主义的路。”<sup>6</sup>

就是在这个谈话里，毛泽东提出了“纲举目张”。<sup>7</sup>这个“纲”，为五年后更大的社会主义高潮提供了政治路线、思维模式和工作方法。“三面红旗”时代的做法、口号皆来源于此——合作化时的“提速”发展为“大跃进”，“多大好省”变成了“多快好省”，用政治绕开法律的做法演变成赤裸裸的“一大二公”，姓资姓社与谁战胜谁的问题成为一切工作的指南。

---

<sup>1</sup> 同上，第116页。

<sup>2</sup> 同上，第118页。

<sup>3</sup> 同上，第117—118页。

<sup>4</sup> 同上，第117页。

<sup>5</sup> 同上，第117页。

<sup>6</sup> 同上，第123页。

<sup>7</sup> 同上，第120页。

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对研究中国现代史，对研究毛泽东思想具有重大意义。这个会议是中国农业从互助组升级为合作社的关口，是中国经济建设中出现的第一次大跃进。同时，它也是毛泽东走向空想，重温“新村”计划的标志，是毛描绘的“最新最美的图画”的第一笔，是毛以数亿国人为试验品，迈向“新世界”的第一步。

此后，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中国大地合作社遍地开花。很快，互助组让位于合作社，初级社让位于高级社，高级社让位于人民公社。所谓“摊派而不强迫”，“自愿两利”，变成了货正价实的强制命令。由此一来，中共中央拟定的数字与下面提供的数字竞长争高，一路攀升——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的决议规定，“从1953年冬季到1954年秋收以前，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应由现有的14000多个发展到35800多个。”<sup>1</sup>这个数字比会议上各大区提出的计划总数高出3300个。可是，仅仅三个月，由于“……购粮工作对农村资本主义自发趋势的抑制，及空前规模地宣传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加上各级党委对互助合作的抓紧领导，……在广大地区的确出现了群众互助合作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的局面。”<sup>2</sup>“各地党委均已根据这种情况追加了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时拟订的办社讲划。……连原有的在内，全国总计划45000多个，较原计划数增加了一万余个。”<sup>3</sup>计划赶不上变化，实际数字更加惊人——“1954年春季一下子就达到了9万多个社。”<sup>4</sup>形势喜人，形势逼人，1954年4月，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修改原计划，“确定1955年发展到30万个或35万个。”<sup>5</sup>上下互动，到了这一年的夏季，农业合作社达到了22万个，上边又一次修订计划，“将30万个或35万个的数字提高到1955年春耕以前发展到60万个。”<sup>6</sup>到了这一年底，“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48万个，其发展势头正越来越猛。”<sup>7</sup>

---

<sup>1</sup> 林蕴晖等：《凯歌行进的时期》，第380页。

<sup>2</sup>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目前各地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情况与问题向中央的报告》，转引自林蕴晖等：《凯歌行进的时期》，第381页。

<sup>3</sup> 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册），第230—231页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

<sup>4</sup> 林蕴晖等：《凯歌行进的时期》，第533页。

<sup>5</sup> 同上，第534页。

<sup>6</sup> 同上，第534—535页。

<sup>7</sup> 同上，第536页。

按毛泽东的想法，生产关系改变了，生产力一定会提高。也就是说，农民一旦成为合作社的社员，劳动积极性就会空前高涨，因此，粮食就一定会大增产，国家就有理由从农民手里统购更多的粮食。事实上，这种无视人性、揠苗助长的生产关系，非但没有提高生产力，反而逼得“生产力起来暴动”<sup>1</sup>。暴动的表现之一是大量出卖、屠宰牲畜，之二是放弃生产，消极怠工，之三是民怨沸腾，骂政府，骂共产党。<sup>2</sup>

这是毛在合作化上碰到的第二个来自下层的钉子。跟第一次一样，他先同意农业部提出的措施，并将其概括为“三字经”——“停、缩、发”——浙江、河北两省收缩一些，东北、华北一般要停止发展，其他地区（主要指新区）再适当发展一些。<sup>3</sup>待局势稍稍稳定之后，毛马上又以更大的热情回到了老路上来——他要求邓子恢 1955 至 1956 年间，要在 65 万个合作社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 130 万个。邓不同意，坚持只能翻半番，达到 100 万个。毛为什么要翻一番呢？因为他认为，“应当利用广大农民由于土地不足、生活贫苦或者生活还不富裕的状况而希望变革的心态，从速引导他们向社会主义过渡。”<sup>4</sup>

不认同这个“穷过渡”的邓子恢很快就遭到了清算。1955 年 7 月 31 日，毛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大批“小脚女人”：“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论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

---

<sup>1</sup> “生产力起来暴动”是毛泽东说的话。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下册），第 955 页。

<sup>2</sup> 关于“生产力起来暴动”的具体表现，《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一书中有详细的叙述，兹摘引如下：关于出卖、屠宰牲畜：“1954 年 12 月，《中央批转〈中央商业部关于目前牛羊市场情况和毛猪生产问题的通报〉》指出：第四季度以来，许多地区牛羊上市量骤增，收购计划大大超过，且有许多母牛、乳牛、小羊、小猪、仔猪价格也随着下跌。这种情况几乎在全国各大市场上均有发现。……当时，畜价狂跌，卖牲口不如杀了卖肉卖皮。热河省委于 1954 年 12 月报告说：入秋以来牲口市场上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反常现象；各地牲口价格普遍下跌 1/3 到 1/2 左右。《华南分局关于目前农村紧张情况与措施的报告》中也说：在购粮运动后期（1954 年 12 月下旬），各地普遍发生农民大量杀猪杀鸭，猪价陡降。”关于放弃生产，消极怠工：“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不少地方农民不热心积肥，不积极准备春耕，生产情况不高。……很多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出勤率大大减低。这除因派工或工分不合理外，主要原因是社员反映吃不饱，无法干重活而不出勤。有的社员虽然出勤，但因吃不饱饭，在田里坐着不干活，有的社员因无米下锅不出门。一些地区的青年团员也消极，反映饿、冷、腿酸，团支部会也开不成。”关于民怨沸腾，骂政府骂共产党：“农民包括许多农村干部流露出对党和人民政府的不满情绪。广东新会县、高要县、东莞县的农民反映：‘现在政府不知怎样，共产党要整死人’；‘辛苦一年没得吃’；‘共产党变了脸’；‘年年有统购粮，以后日子怎么过’。农民的不满情绪溢于言表。”见高化民：《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第五章 第三节，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年。

<sup>3</sup> 林蕴晖等：《凯歌行进的时期》第 545 页。

<sup>4</sup> 同上，第 558 页。

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这是5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sup>1</sup>

1955年10月4日到11日，中共中央召开七届六中扩大全会，11日，毛泽东为全会作总结。在这个总结里，他透露了推行合作化的深层动机：“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sup>2</sup>

“使资本主义绝种”是毛泽东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是毛式新世界的根本特征。所以，毛泽东企图通过“穷过渡”跨越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所以，十一年后，在“新人新世界”的纲领——“五·七指示”里，毛泽东念念不忘的是“批判资产阶级”。在毛看来，一穷二白是好事，是“使资本主义绝种”的灵丹妙药；换言之，富裕会使资本主义自发地产生，而贫穷则是社会主义的最后保证。

为了尽快完成“穷过渡”，毛亲自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为它写了104篇按语。在这些按语里，他批评“砍社论”、“下马论”、“穷拉平”、“办社容易巩固难”、“合作社只有三年优越性”、“耕牛死亡罪在合作社”、“农村紧张由于合作社办多了”等“错误思想”。命令全党积极办社，并提出了办社的具体措施。与此同时，党内外的反对派、消极派、观望派被打成了主观主义、机会主义和右倾保守主义。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终于到来。

看一看八十年代实行的农村改革，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发展”还是冒进一目了然。这一冒进既是毛泽东空想的产物，也是他进行新世界试验的基础。这个冒进对于他的整个战略部署来说太重要了，没有这个冒进，就没有1956年中共向全世界宣布进入社会主义的资格；没有这个冒进，“穷拉平”就不能进入“穷过渡”；没有这个冒进，就没有总路线、

---

<sup>1</sup> 毛泽东：《关于合作化问题》，《毛选五卷》，第168页。

<sup>2</sup> 毛泽东：《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毛选五卷》，第198—199页。



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就没有“一大二公”。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在1956年3月的成都会议和其后召开的八大二次全会上，毛泽东痛斥党内务实派的反冒进。<sup>1</sup>1957年反右之后，毛泽东再次跟务实派们算账：正是你们的反冒进，为右派分子提供了口实。<sup>2</sup>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在出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时候，毛泽东不得不自改雄文，以表明自己的一贯正确。<sup>3</sup>只有打下去反冒进，才好更大的冒进。

经济跃进与思想改造互动，毛泽东在高兴之余，把目光转向国内唯一还有资本可以同共产党较量一下的知识分子身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未落，反右派斗争开场。“双百”方针成了历史的讽刺。思想改造方面的“胜利”，引发了新一轮的经济建设高潮。“于是，以‘共产风’为主要特色，以‘一大二公’为基本形式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展开。”<sup>4</sup>新一轮的自我否定随之而来——“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sup>5</sup>那末，什么是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呢？在北戴河会议上，毛对此做了说明：“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sup>6</sup>

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曲折实践证明，空想不仅仅是“三面红旗”的灵魂，<sup>7</sup>而且是整个毛泽东时代的灵魂；将空想说成理想，并将其强力推行下去才是毛泽东的贡献。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时代的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思想改造与经济跃进或同时或交替发生。两者相互倚重，互为因果——思想改造是为了经济跃进，跃进的结果使毛更加迷信思想改造。二是理论与实践处在不断的自我超越和自我否定之中——用社会主义超越和否定新民主主义，用共产主义超越和否定社会主义，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来超越、否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总之，以空想来超越、否定实际。毛泽东的“不断革命论”，正是对这

---

<sup>1</sup> 萧延中：《晚年毛泽东》第132页。

<sup>2</sup> 同上。

<sup>3</sup> 席宣在《“文化大革命”和平均主义》一文中谈到，“1951年，由于党中央领导人在发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问题上有不同意见，批判农业社会主义、平均主义的思想教育就停止了，并且对于这种批判长时间成为禁忌。甚至在出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修订《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文时（此文作于1948年4月1日——本文作者），把原有的批判农业社会主义的字句也删去了。”见《晚年毛泽东》，第123页。

<sup>4</sup>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11页。

<sup>5</sup> 同上。

<sup>6</sup> 萧延中编：《晚年毛泽东》，第178页。

<sup>7</sup>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11页。

种自我超越、自我否定行为模式的理论概括。国内主流观点认为，毛的空想是从 1958 年八届二中全会开始的。<sup>1</sup>这种以《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指南的结论，并不符合事实。事实是，早在五十年代初，毛泽东就开始了空想。

这两个特点的形成，与毛泽东的“新人新世界”情结密切相关——思想改造是为了锻炼新人，经济跃进是为了创造新世界。改造从农民开始，随后转向知识分子，再后来转向党内。自我超越和自我否定的目的是“提纯”和“加速”。“提纯”即不断地在革命队伍中寻找、制造对立面，将其剔除，达到纯洁化——先反对买办资产阶级，继而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继而反对知识分子，继而反对党内的走资派。以加快创造“新人新世界”的步伐。

## 六、五·七指示：新世界的真面貌

关于人民公社，人们已经说了很多，这里想强调的是，人民公社对于毛泽东有着独特的意义——它为毛式的“新世界”提供了可以仿效的社会结构。1958 年，当全国人民“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时候，陈伯达代表毛泽东向人们传达了这样的信息：“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sup>2</sup>

“公社”在称谓上固然很容易让人们想到被马克思赞扬的巴黎公社，但是它很有些不尽如人意之处。首先，“公社”是一个生产单位，它只能是一个“生产队”，难以担负起“战斗队”和“工作队”的任务。其次，作为生产单位，“公社”缺乏军队、学校一类机构的组织功能。第三，从习惯上讲，“公社”更多指的是农村，要把这种新型的社会单位推向全国，最好另辟蹊径。大跃进八年后的一天——1966 年 5 月 7 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里，提出了“大学校”的理念——

---

<sup>1</sup> 同上。

<sup>2</sup> 见《红旗》杂志 1958 年第 4 期。

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要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当然，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sup>1</sup>

1966年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的社论，第一次将这个被称为“五·七指示”的圣谕公之于众。社论说：“把人民的军队办成革命的大学校，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贯思想。”“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国人民，把我国的工厂、农村人民公社、学校、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也都要像解放军那样，办成革命化的大学校。”“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

学校的基本功能是从事教育——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地教育人。从“把工、农、

---

<sup>1</sup> 《文化大革命资料》（上），第61页。

商、学、兵组成一个大公社”到“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在实施人性改造工程方面的良苦用心。为了实现“彼时天下皆为圣贤”的伟大理想，毛泽东经过四十多年的摸索，终于找到了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的最佳途径。所以，《人民日报》社论向人们预言：“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培养出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全面发展的亿万共产主义新人。”这个大学校不同于一般的教育机构，与仅仅从事生产的人民公社更大异其趣。如果以人民公社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它不但缺乏学校的功能，而且缺乏严密的组织，没有钢铁般的纪律，没有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美德。因此，要把中国“从根本上改造成一个大的理想的新村”，最理想的社会基本单位应该具备两条，第一，它应该像解放军那样，“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又是生产队”。第二，它应该具备学校的功能。也就是说，它应该是军队与学校的结合，或者是军队式的学校。所以，《人民日报》社论要求人们：“全国的工厂、农村人民公社、学校、商店、服务行业、党政机关，都要以解放军为榜样，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总之，在毛的心目中，这个基本单位应该既是培养新人的温床，又是新世界的细胞。

不少研究者都谈到了这个新世界的特点——这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上反对等级制，特权制的，经济上均贫富、平均主义的社会。是一个限制和逐步消灭了社会分工，限制和消灭了商品生产的，自给自足的，小而全的，封闭式的社会。并且把这个新世界定性为军事共产主义、农业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等。<sup>1</sup> 但是，人们似乎忽略了这个新世界的两大基本特征——

第一， 极端的专制性。这个社会只能是一个高度一体化的，全能主义的社会。否则这个社会就无法“以阶级斗争为纲”，<sup>2</sup> 就无法“限制和逐步消灭分工与商品”。

3

第二， 永恒的斗争性。这个社会是一个不断革命，充满斗争的社会，因为它的每个成

---

<sup>1</sup> 如：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5页；王禄林：《五·七指示初探》；席宣：《文化大革命与平均主义》；胡长水：《乌托邦荒原：“三面红旗”剖析》。后三篇文章见《晚年毛泽东》。

<sup>2</sup>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5页。

<sup>3</sup> 同上。

员都要“批判资产阶级”，都要改造思想，纯化道德。这就意味着，在这个社会里，资产阶级的人物或思想会无止无休地产生出来。也就是说，“批判资产阶级”将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战斗。

这两个基本特征，决定了新世界中的新人模样——他们是雷锋与红卫兵的结合体，既甘做革命的螺丝钉，亦工亦农亦文亦武；又勇于“造反”——发现资产阶级，“批判资产阶级”。换言之，生活在这里的新人是丧失了自我，泯灭了人性，绝对忠诚与服从的政治工具、劳动工具、学习工具——这种人与其说是新人，不如说是“工具人”。

然而，即使按照毛“不断革命”的逻辑，这样的新人新世界也是无法长存于世的——既然资产阶级永远消灭不完，既然世界上总有人受压，革命就不会终止，<sup>1</sup> 新世界就不会得到安宁。而资产阶级——按照毛的说法，“政治上、思想上的资产阶级”将从哪里产生呢？看来只能从新人/“工具人”中产生。也就是说，这里的新人随时都可能变成敌人，变成批判对象。延安整风运动中锻炼出来的新人，如丁玲，不是后来又变成了反革命了吗？整风运动的领导者，天然的新人，如刘少奇，后来不是也变成了“三反分子”了吗？看来，新人的队伍就像文革时的造反派组织一样，处在不断的更新与提纯之中，纯洁的“工具人”揪出不够纯洁的“工具人”，更纯洁的“工具人”揪出纯洁的“工具人”，递进往复，永无穷期。

在这个永无穷期的战斗里，没有胜利者，只有失败者。土地改革，地主、富农被打倒，合作化人民公社，贫下中农更加贫穷；工商业改造，资本家、小业主交出了工厂店铺，随即成了社会贱民；反右运动，知识分子成了被改造的对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基层干部成了整肃的重点；文化大革命，党内务实派全线崩溃，不是进了牛棚就是进了秦城。当这些人被全部打败之后，毛泽东惊异地发现，他并不是胜利者：旧世界砸烂了，新

---

<sup>1</sup> 毛泽东在 1975 年 10 月至 1976 年 1 月的讲话中说过：“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还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們要革命呢。”转引自《晚年毛泽东》，第 296 页。

世界并没有出现——它“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sup>1</sup>

“治乱迭乘，平和与战伐相寻者，自然之例也。伊古以来，一治即有一乱。吾人恒厌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吾人览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恶之，非好乱也，安逸宁境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生所喜也。”<sup>2</sup>厌恶承平，热爱乱世，在大乱中去发挥人的最高本质，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一直斗到尸横遍野，唯余茫茫。这个世界确实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新世界，但是，它能长久吗？它还能称为世界吗？

“五·七指示”并不是新人新世界的蓝图，而是现实的缩影与提升。它并不是毛泽东在文革前夜突发的奇想，而是其长期革命实践的产物。它不是什么关于未来的“纲领”，而是从延安整风开始就已经逐步推行，并且部分变成了中国的现实的思想范式和文化传统——反右运动是延安模式的沿续和发展，延安是从正面锻炼新人，反右则是从反面锻炼新人；55万右派打下去，无数新人站起来。雷锋精神、红卫兵运动不是从天而降的神迹，而是长期思想改造产生的怪胎。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合作化运动的继续和光大，后者为前者提供了思想改造与经济跃进相结合的操作方式，提供了自我超越、自我否定的思维方法，粮食亩产千斤、万斤、十万斤的不断刷新，不过是上述思维方法的普及化与具体化而已。而这一切之所以能够成为现实，除了枪杆子的伟力外，还要归功于《新民主主义论》。没有它提供的“资本主义必败，社会主义必胜”的革命理论，没有它预设的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毛泽东的新人新世界理想充其量不过是发表在刊物上的计划，写在书眉上的狂言。

因此，作为现实的缩影和提升，新人新世界既不神秘也不遥远，它存在于每一个生长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心里，存在于中国近五十年的现实之中。中国人虽然还没有完全被

<sup>1</sup> 这是毛泽东1974年10月20日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的话，转引自《晚年毛泽东》，第116页。

<sup>2</sup> 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4章“害及恶”的批语，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第184—187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

改造成新人，但已具备了新人的某些素质。中国社会虽然距离新世界遥遥，但是这个新世界的某些要素已经成为顽固不化的中国特色。

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到“狠斗私字一闪念”，从“新村”计划到“五·七指示”，从无政府主义的空想到全能主义的乌托邦，毛泽东用他的一生转了一个圈。为了这个圈，他花费了三十年的时间，用国人的鲜血和生命，在中国的大好河山上画了一幅又一幅“最新最美”的图画，进行了一场又一场新人新世界的实验。到头来，只落得个国危民困，百弊丛生，遍地疮痍，遗患无穷。当邓小平重新拾起资本主义，当少数富起来的人再一次进行原始积累的时候，中国人才体会到“吃二茬苦，受二遍罪”的真实含义。<sup>1</sup>

2001年12月竣稿

此文收入日本成蹊大学石刚教授编著的《现代中国的制度与文化》一书，香港社会科学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3月出版。

---

<sup>1</sup> 这一观点来自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印红标先生。

【要有光】

为了孩子，饿死也不肯倒下的妈妈（胡 杰）





【要有光】

# 陇西逃荒人王兰芳访谈

## 依 娃

受访人：王兰芳，女，76岁，陕西省户县涝店乡里贤庄人。逃荒前为甘肃省陇西县玉峰乡前进大队人。

时间：2013年9月8日。

录音长度：26分钟。

采访地点：陕西省户县涝店乡里贤庄。

大饥荒饿亡者：杨老四，男，30多岁，甘肃省陇西县玉峰乡前进大队人，饿亡。王兰芳，杨妻，女，30多岁，甘肃省陇西县玉峰乡前进大队人。王兰芳的二伯、二娘、三娘、三娘的一个男娃娃等，甘肃省陇西县玉峰乡人，饿亡。死亡人数、姓名、年纪不详。

依：姨，你多大了？

王：七十六了，我属虎的，我名字叫个王兰芳。我来了好多年了，我以前在陇西县，陇西县大得很，以后又把我们分成小县，旧社会是一个县。解放了，人家说太大了，就分出去了个漳县。

依：你在陇西哪个乡？

王：陇西玉峰乡前进大队，名字还好听得很。

依：你在家的时候生活怎么样？

王：爷！五八年还可以，到了五九年是翻箱倒柜，那是国家的政策下来了。本来咱那个山区地方地里粮食就打得少，那些干部表现积极哩，书记说一亩地打一千斤。咱那山区地，能打上三四百斤都是好的。我看见人家做了一个大船，把那个麦糠往里面放，上面铺上些麦子，就说是麦，都是假的，哄人哩，说空话哩。以后粮食就拿完了，拿完了就把人饿着。到了五九年的快过阳历年的时候，来人就翻箱倒柜把粮食都拿完了。到了阳历的二

月，没有见到一星星面！地里的野菜，都挖得干干净净的，一下都吃了。一下子把人饿的。

依：没有吃的了，你们吃什么度日子？

王：没吃的了，人凑合着能动弹了，咱那里有那个苦曲菜，都挖的吃光了。给猪晒干的苦曲菜都吃上了，把那个榆树皮一刮，剁成块块，到磨子里一磨就吃那个面。柳树叶子做的糊糊，苦得吃不下去，但是你肚子饥，不吃也得吃。只有砖头、石头吃不下去，再啥都能吃下去，只要肚子里装上好受一点。把玉米芯磨成面，和榆树皮面和在一起，熬成糊糊喝。唉——！咱把可怜受多了。

依：你敢偷队里的苞谷、谷子、穗子吗？

王：哪里有嘛？统一都是没有吃的。人家书记、会计、村长，人家还生娃哩，就可怜了个咱农民。我到街道上，捡到一个小狗娃，我妈说：“你把那个弄回来弄啥？”我说：“猫儿也吃哩，狗儿也吃哩，人家把狗踩在脚底下多受罪。”我妈说：“你不要给我说这个话，扔出去。”人都没有吃的嘛。

依：你村里有饿死的人吗？

王：爷！五九年，五九年，五九年快过年的时候，没有见过个面。到六零年饿死的人多得很。我看见一个小伙子，就坐在墙边，就那么溜倒死了。前面死的人还有人给埋，后面死的人就没有人给埋了。娃娃、大人都没有人埋，就叫狗吃了。

依：你看见了没？

王：当然看见了。看见残忍得很。有一家子人，和我们有些亲戚关系，早晨，队长说：“你去看一看，那家子门还没有开，看看咋了？”我嘴上没有说，心里说：“唉——！怕是都死了，不死他早晨起来就开门了。”我去把门一开，两口子这头睡着哩，一个娃还爬在她妈身上吃奶哩，还有一个老人和一个小女子在另外一头睡着。我不敢看，不敢看，可怜得害怕。我出来，我说：“人完了。”队长说：“啥完了？”我说：“这两口子都死了，小娃子还爬在她妈的奶头上吃奶哩。那个小女子还睡觉着哩。”这是我姑婆的兄弟家，队长说：“你去，把那个娃抱出来。”我说：“把娃抱出来？我还没有吃的，把那个娃抱出

来弄啥？”两口子饿死了，娃娃还在他妈奶头上吃奶哩。

依：两个娃娃多大了？

王：娃才一岁，女娃三岁，啥都不懂。书记说：“你没有办法，我也没有办法，给国家送。”办了个孤儿院，叫娃先吃些，就把两个娃娃送到孤儿院……我那一年回去，那两个娃娃把我叫姐。我说：“你是谁？我都不认识，你大是谁？你说说名字，我就知道了。”

依：他爸叫什么？

王：他爸叫个杨老四，他妈叫个啥？不记得了。现在这两个娃都五十多了。

依：你自己家呢？

王：我娘家二十几口人，死了几个人。我三爸的一个娃，我兄弟死了。还有我一个妹子，我二伯，我二娘，我三娘，还有两个娃，也死了。都饿死了，我都不敢提，一提我心里就难受得很。自己的亲人嘛。我家就留下我兄弟、我妹子，还有我。

依：你是哪年来的？

王：唉——！我是六二年过来的。

依：你来的时候已结婚了吗？你都二十四五岁了？过去的事情了，不怕。

王：说起来是结婚了，没有在一起。还没有娃哩，我不爱去他家里。以后受了饿了，他家里也有老人。我对老人说：“我出门吃肚子去，过个一两年我就回来了。”我来陕西了，又不想回去了。我就让人写了个信回去给他说：“咱们各走各的路。”就算清白了。

依：你是自己来的？还是有人领来的？

王：我自己跑来的，独个跑过来的。

依：你身上有钱买火车票吗？

王：有些钱，那些年从陇西搭火车来陕西才八块钱，西安到户县的汽车票才四毛钱。那个时候路上没有人挡，没有人管。

依：你怎么知道往陕西跑的？

王：我是胡走哩，走到哪里算哪里，那一年我二十五六了。我就胡走，过去了就忘记

了。

依：你路上吃啥？

王：路上，一夜就到这里了。没有吃啥，就饿着。

依：有没有个包袱、行李？

王：就穿一身衣裳，就是一个人，没有个包包、包袱，啥都没有。没有手巾、没有梳头的梳子，就是带了一个人，还有鼻子、眼睛都带上。我搭车哪里来的钱？那个可怜，西边有那个核桃，我们那里核桃树多得很，还要做贼哩，嘿，嘿嘿。咱自己家也有核桃树，人家也有核桃树，到这家摘些到那家摘些，把那个核桃卖了，一斤核桃才两毛钱。就可怜的当路费，有个十多块钱就好得很。

依：你到哪里下的车？

王：我到西安下的车，西安到户县还是搭汽车。

依：那你到这个家有人领吗？

王：到这里还是有人领，走到哪里算哪里，在各个村子里转。

依：要着吃，你要了吗？

王：要哩！要上啥吃啥，不要吃啥？我没有要多长时间，东边有个小羊河，在那里住了四五天，这里的人给我说了说，我就到这里来了。那是九月份，人家把我拦住，就到这来了。这个家里人不多，就一个老人，一个老婆婆。

依：你掌柜的（土语：丈夫）多大？

王：人家叫个王志茂，比我大了五岁。人家还精神。王兰芳和丈夫王志茂。今年都八十一了。

依：有了几个娃？

王：娃娃不少哩，两个男娃，两个女娃。说起来就是老话了，咱自己三个娃，那一年到公路上又拾到一个娃，那些年扔掉的娃娃多得很。那一年，他大到公路上，看到一个娃，前一天生下来，我们第二天拾回来，就是我这个小女子。娃乖得很，放在炕上，肚子饿了，

也不哭，就看人哩，乖得很。我就拉扯大了，就是我的娃了。

依：你那女子多大了？

王：现在都三十几了。娃抱回来，大些了，这个也要，那个也要。我说：“这是我的娃！我舍不得给人。”没有给远，就嫁在一个村子里，能经常见个面。我娃有心得很，自己生的都没有那么好，那么有心。

依：人家娃知道你把她养活大了？

王：自己养活大的就是自己的娃，这个女子回来总是拿好多东西给我，卷起袖子就进厨房给我做饭下灶。叫“妈”叫得亲得很。

依：那年国家让甘肃来的人回甘肃去，有没有让你回去？

王：让人回去的时候，要送人我就没有回去。我没有回去，没有回去。我回过几次家，回娘家看一看。家里也没有啥亲人了。

依：你们这个村子甘肃来的女人多吗？

王：唉——！这一个村子就有六个，都是甘肃那几年来的女人，有的来的早些，有的来的迟些，有姑娘，有结了婚的女人。那些年，女人都是小脚，走路都不稳，唉——！不为逃活命，走不了这么远的路。倾听诉说。

依：那时候地里有没有打下粮食？

王：粮食打下了，是说了空话了。光往多里说，一下子都拿完了，把人都饿死了。

后记：最为让我感动的是，饥荒年过来的王兰芳有着慈悲之心，一个小猫她都不舍得让饿死。路上捡到一个小女娃，说“这是我的娃。”弃女当成女儿，她辛辛苦苦给养活大了。

【札记】

# 毛泽东、萧军与王实味

胡庄子

王实味（1906—1947），河南潢川人，1925年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预科学习。1926年1月加入中共。1927年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这一时期，他在谋生的同时，进行小说创作，并翻译外国文学作品。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在河南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10月，王实味奔赴延安，先在马列学院编译室从事翻译工作，后任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的研究员。在萧军的眼里，他是一个摇摇晃晃的高个子，白面孔，半疯半狂的神经质的人。王实味与毛泽东见过面没有、认识不认识？我还没有见到这方面的史料。

无论如何，毛泽东与王实味，王实味与萧军，毛泽东、萧军与王实味，有着无法分割的联系。

## 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惹了祸

延安的山上，生长着野百合，一到夏天，就开花了。延安的本地人和住上一年的外来者都知道的这一自然现象。

1942年3月13日、23日《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上发表了王实味的一组杂文，叫《野百合花》，文章批评了延安存在的“食分三等，衣分九色”的问题，其中也有对食品供应不足的牢骚。文章的主旨，是要求平等平均。

1941年-1942年春天，延安的政治环境还比较自由、松弛，一些到延安的知识分子，以画展、戏剧、墙报、杂文的形式，表达自己对延安的观感——主要是“失望”，揭露延安的“阴暗面”。《野百合花》是其代表之一。

王实味的文章，被认为是以错误的方法批评党的领导干部及当时延安存在的问题。陶铸在文革初期曾对红卫兵说起这段往事：“在延安时津贴最高五元，稍微有所不同，因此反

动文人王实味说‘食分三等，衣分九色’，绝对平均主义不可能。”（陶铸同志1966年11月16日接见辽宁大学八三一红卫兵谈话纪要，《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内部材料》第六册总第887页，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红卫兵1966年12月编印。）

王实味惹祸了。

1942年3月31日，毛泽东召集座谈会，座谈《解放日报》改版问题。

《解放日报》是中共中央在延安时期的机关报，创刊于1941年5月16日，毛泽东题写报名并撰写了发刊词。这张报纸创刊不满一年，毛泽东要求它改版，可见对它不太满意。在座谈会上，毛泽东说：“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近来颇有些人要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409页），这些话，针对的是《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作品的倾向性问题。

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宣布从即日起，报纸版面彻底改革，使之“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

4月初，毛泽东亲自到中央研究院看《矢与的》墙报，那上面刊登有王实味的文章。毛看后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这也是有的放矢嘛！”（《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第373页）——是否从这个时候，毛泽东决定把王实味当作“靶子”？

是谁首先“发现”了王实味，是谁第一个点王实味的名？是毛泽东直接发现了王实味还是其他人的进言而引起毛泽东重视的？这还需要新的史料来证实。

萧军在《延安日记》中说，4月4日，王震在毛泽东的住处对毛泽东说，有些人不满意解放日报那篇《野百合花》的文章。萧军在自己的日记中描写王震当时的样子：“很气愤的样子”。

4月7日，毛泽东和萧军商量着，要召开文艺座谈会，先个别座谈会，后开一个总座谈会，解决文艺界的问题。这个座谈会，就是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在这个座谈会上，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以，如果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王实味有关系，也是可以的。



不久，延安就出现了批斗王实味的浪潮。中共领导人中，许多人都点名批评或批判王实味。

## 半路杀出个抱打不平的萧军

对王实味的批判，是一面倒。总之，是群起而攻之。

这时，身在延安的鲁迅弟子、党外作家萧军站出来说话了。

5月22日，在杨家岭召开的第三次文艺座谈会上，萧军为王实味辩护，他说：“我仍然承认他主观上是站在革命立场上，根据是他是个党员。对于王实味批判的态度是不对的。究竟对他是同志还是敌人？”（1942年5月25日日记，简写42-5-25，下同）

5月27日，中央研究院对王实味进行第一次批判。

5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说：最近一个时期，某些文章，某些文学作品——当然只是一部分，发生了一些问题。……个别比较严重的就是王实味这个同志，他的思想是比较成系统的，似乎坏的东西比较更深一些。（《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426—427页）

在被批判中，王实味提出自动脱党。

这实在不是一个智慧的选择。

6月2日，作家萧军听说王实味的这个决定，他认为：这是党内一些无知的人以批评为打击的结果。……从一个党员立场看他，他这是不对的事；从一个“人”的立场来看，那是应该同情。……党方面的处置不当，如果一时要保持党底尊严，任他脱党，这影响：A，敌方可利用这事宣传为王实味被开除党籍，证明共产党的民主等全是谎言。B，对于一般党员在心理上会留下这样一个阴影：“啊！不要多言了罢，万事大吉”。C，对于王实味只有反革命路一条。这是一种各方面的损失。“人到了对于自己的前路完全感到黯淡，所受到大的打击超过自己禁受的力量时，这时候人会感到情操的破灭……目前不是王实味本身问题，而是党的影响问题……”（42-6-2）

当有人说王实味是叛徒时，萧军说：这是不能作为叛徒看的，如果在十年前内战时代，这也只能说是革命逃兵……在现在他虽然脱党，但他仍在抗日，他还不失为一个中国人，你也有义务和他合作……我懂得你的感情，也赞成你的立场……但是我愿你再以“人”底一面去看看，从你自身来对比，从全般事情经过来论断，你就不会太激动了。

6月2日10点多，为了王实味的事，萧军直接来到毛泽东处，向毛泽东陈说。日记记载了毛泽东和他的对话及态度：

他起始似乎很困疲和懊恼的样子，也许在烦厌我又去多事，但我却不管这些，严正地把我的意见说给他听，不出所断，他说，他要脱党也无办法，也不是哪个强迫他的，“共产党有这一条规定，没有入党的自由，有退党的自由……如果他要退党那也没办法……他这里面还有别的问题。”“这仅是我个人的一点见解，我本可不管或不来，因为这是你们‘家里事’。但是我恐怕你不知道，明天他们就开会，那样木已成舟，挽回就不容易……简单说，王实味这行为我不同意，但一些人们那种不正当的批评态度我也不同意……我最终的意见，就是王实味现在脱党对于党以及他自己全无好处。”经过我耐心结实，他似乎也明白了。（42-6-2）

不过，从此以后，毛泽东疏远了萧军。

6月4日，中央研究院第二次批斗王实味。这次批斗会，萧军参加了。日记记载：

（王实味是）今天要在这大会上做箭垛的人。

第一个和第二个发言的恶劣和阴毒已经使我憎恨了，但我忍耐着。他们从思想、政治、组织上断定他是“托派”思想，肯定他是托派。用各种证据想证明他是有计划、有阴谋来进行破坏党，侮辱党的托派流浪份子……或者是小资产阶级染着托派思想的份子……他们完全不懂自己是什么东西……这正是社会上一些犯了罪的人而判别人罪的形象。接着是王实

味自己发言，会场轻轻引起了一阵骚动。接着这个半疯半神经质的人站起来了，他发言还不到几句，下面就有一些人‘打’断他的话，像一群恶狗似的，伸出嘴巴向他围攻了……致使这狂热人不能继续他的说话，而主席还纵容着不管，这简直是一种阴谋！一个女人嚷着叫他去自杀……这使我再不能忍受了，我终于发了言：“主席，这是不行的，应该让他发言说全了话大家再反驳他……无论什么会场全有个秩序呀……”

……

6月6日，王震说到王实味：“他简直不够一个文化人。”萧军听了，又将自己的想法与王震说了一番，为王实味辩解。

6月10日，中央研究院全体人员、中央医院到会代表苏爱吾等108人签名（108人的名单。待考），致萧军《抗议信》，抗议信说道：

据许多同志对我们说：你在参加了我们对于托派份子王实味的斗争会议之后，你曾对我们的座谈会加以诬蔑，认为是“倒尿盆”“狗打架”“假公济私”，我们认为你这种态度是不正确违反真理的，不管你主观动机如何。我们这次座谈会是清算王实味的托派思想及其反党活动，我们的斗争是有原则的，有根据的，目的是为了教育自己及巩固党，因此不仅党员应该积极拥护，而一切党外人士也应该抱同情的态度，给与积极的帮助，但使我们十分惋惜的，是你所表现的，并不是一个友人应有的态度，因此我们希望你好好地反省一下，改正这种错误观点。

萧军根本不认可108人的“抗议”。

他就对王实味事件的看法、过程、前因后果等，写了一个《备忘录》，于6月20日直接送给了毛泽东。

他说：《备忘录》就是我和共产党友情的试金石。

6月29日，他在日记中写道：王实味绝不是一个“托派”，他们这次是用的政治上的“苦

肉计”，为了消除他文章上的党内党外的影响，所谓“一俊遮百丑”的办法。但他们把我拖上，却是愚蠢和绝对错误的。

萧军同情王实味，仗义执言。他说，“拼出一把生灵骨，探探黄河几澄清”。（42-6-11）

萧军为王实味辩护受到指责后，他在日记中激愤地写道：①抛弃一些幻想、过多的热情，一生决不加入任何党派，以文学终生。②对于共产党我只在外面为它服务，因为他目前还是中国进步的政党，我不因少数坏种伤害我，或它们本身卑劣对该党本身有何对该党本身有何损害。但我要有限度取着距离，不花费过多的热情或伤害到自己。但决不加入他们一伙。③对于共产党人决不再和他们谈更深的友情，我原谅他们，但我也不愿浪费自己的感情。因此采取私生活上和他们绝缘。④对共产党人决不谈论党好坏是非，对于党外人也不谈，也不积极表示自己的态度……一切要以沉默，一切记在日记上，但斗争还要斗争。⑤在我和党人的接近，一定要采取距离和防备，不做内心谈话，拒绝一切辩论，拒绝一切说服。⑥一般工作可以参加，但要有限度。决不描写我所不乐意描写的东西。⑦忍耐着，以发配的心情忍耐着，完成自己要完成的工作。⑧以此次事件为界限，此后关于党内人们底曲直决不再管，这是他们自己的运命。被一切感情的关系结束。（42-6-5）从此我决定和所有共产党员，完全断绝友谊关系，我断然走自己的路，决不再脱下掩心甲或放掉战斗的兵刃。从此我更懂得了“人”，也懂得了“党”，这是我忠心于共产党所得到的酬报。……我是愿意和共产党保持着二指宽的间隔的。（42-6-17）

这期间，徐特立老人好心地、关心地提醒萧：不要上了当，王实味那是个坏东西。

（42-6-30）

这期间，中央研究院有人提出：驱逐萧军出边区。（42-10-4）

有人提醒萧军说：明哲保身，不要弄成王实味第二。（42-9-28）

萧军作为对共产党友好的党外人士，王实味事件使他内心十分矛盾。“反叛与和解的心情与思想，总是每天在我的脑中战斗着”。（42-7-11）他说：经过这次事，使我更清楚地懂得他们的前途、能力和魄力。他们自大和自足，他们狭小不能容纳强于自己的人。他们

口头上说不怕批评,不怕舆论,实际上外强中干,比方“轻骑队”现在就不敢出来了,报上也再见不到一篇批评性的文章。这种冲动的,无终始的,无深刻性的作风,不是一天就可以改正的。(42-7-10)

6月19日,毛泽东说:现在的学习运动,已在中央研究院发现王实味托派。我们要发现坏人,拯救好人,要有眼光去发现坏人,即托派、日特、国特等三种坏人。(《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第387页)

这里所谓的“托派”,指中国的托派。托派起源于苏俄,是无产阶级政治中分裂出来的一股势力,因构成对斯大林正统权威的挑战,为苏联及其领导的共产国际严厉打击。中国也有一批是托派的追随者。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队伍中有些人采取托洛茨基立场,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应采取“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取消革命运动。后来,在托洛茨基直接撮合下,在1931建立了中国的托派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1935年改称“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的领导成员先后被国民党逮捕,这个组织随即瓦解。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自然视托派为不共戴天之大敌。

1942年7—8月里,中央研究院查出所谓的“五人反党集团”。这五人是:成全、王里、潘芳、宗诤和王实味。

10月12日,陈云约见萧军。一则是向萧军通报情况,证明王实味是托派,强调“还是党内养着他”。二则是问萧军在中央研究院的那些话是否说过,还说萧军那天的发言态度不好,不应用《备忘录》这字眼……。萧军则坚持自己的立场,丝毫不后退。(42-10-12)

10月18日,在鲁迅先生纪念会上,萧军演讲。他演讲中,涉及到王实味及《备忘录》。会上,他受到文艺同行的攻击,也得到许多人的同情。

萧军坚持认为:中央研究院对于王实味这种“诬良为盗”的办法,我是反对的。(43-4-16)

因为同情王实味,为王实味辩护,萧军与毛泽东的关系疏远了,与公家的关系也越来越差了。他说:“到毛泽东那里起串门全没了兴致。”(42-6-7)当然,毛泽东也疏远了萧军,此后很长时间不再见他。

1943年初,是萧军最不好过的日子,“流戍一般”,乡下居住,日常吃用公家不管他了。他到处借粮,数天吃不到一丝肉,他和夫人做梦都是一些食物的梦。有一天,他读了一本旧刊物《中国文化》第六期上刊登的王实味的《文艺民族形式问题上的旧错误与新偏向》,他在日记中感慨道:

实在还寻不出他的“托派”和“特务”的主张在哪里,而且我也同意他的主张。若非说是“反革命”,只是这作者对于共产党两位愚蠢、武断、机械论者的“理论家”——陈伯达,艾思奇——做了批评。如果若不是“断章取义”,我认为也是该当的。至于对胡风那文句和“左倾”的意见,我也是同意的,但他却一直被认为是“托派”而被绑上了“刑场”——也许是政治上需要这样一个“牺牲者”罢,但我却一直怀疑着。如果为了玩“政治戏法”而出此,这是一种可怜的方法!不能否认这作者是聪明敏感的,较之陈、艾之流是超越的,虽然还闪露一些“才子式”的锋芒。(43-2-17)

## 王实味的声音与身影

在对王实味的大批判中,我们看不到王实味的身影。不是被批判者不在现场,而是他被批判者强大的声音(包括后来的历史叙述)遮蔽了。

好在,在现场的萧军当时随手记录了一些,让我们看到斗争双方中,弱的、个人的、非组织的一方的情形。

10月1日,王实味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希望萧军转交。难得的是,信的全文被萧军抄在了10月2日的日记里:

伟大的乔、转呈伟大的毛主席、转党中央:

我要请教你们伟大的伟大的伟大的,

人为什么定要用“脚底皮”思想呢？为什么人在如“象”如“熊”更能解决问题时，却是蠢到非用“狐狸似的小狡猾”不可呢？？

为什么“为工农”的伟大的伟大的那样多，而工农却觉自己是“三等革命”“不是人”“没有出路”呢？

为什么“头等革命”是唯物论，而“三等革命”却必须是唯心论呢？

为什么说谎的是好干部，而老实人却反革命呢？

为什么那种一方面对着手枪，一方面对着监狱和死亡，学信告诉我，“干兄与国兄拼命要好，但对自己亲兄弟却以刀枪相向”的可爱，可怜傻到极顶的“心”，伟大的人们却不懂得用“心”去征服，而定要把他们或逼上梁山或驱入灭亡呢？这是聪明还是愚蠢呢？

为什么鲁迅临终时要拉着许广平底手按在他心上呢？

亲爱的同志们，我无论如何不能疯狂，我知道有些心会为我疯狂而冷掉，那些心并没有因为反王实味斗争而受了太好的教育。救救我罢，把我送到一个安静地方去哟，我要安静安静呀！不一定到颐和园北戴河或莫干山呀，看看吴满有家里能有一席之地没有？我必须离开中央研究院，必须！

反革命王实味顿首百拜千拜万拜。

10月2日，王实味来找萧军。萧军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当时的情形——

早晨将吃过饭，在门前站着，忽然王实味从山下走上来，手里拿着纸一样的东西，喊着我的名字：“萧军，你也是反革命……，我也是反革命……我们来谈一谈罢……”这种不伦的呼喊，使我直觉地愤怒了，我疑心他来和我找麻烦，或者带着什么阴谋来的，我骂了他：“滚开！谁是反革命，你再向上走我踢你下山去……”我说着，向他走去了。“呀……连你全不了解我了呀！真奇怪……我就走……这有一封信请你转……你看了……就明白……”当我走到他的面前，他的眼睛红着，充满着泪水，头发蓬蓬，脸色苍白……那完

全是个病患者。他一支手提着一条棍，腿在颤颤动着，正怯怯向山下退着……。当我从地上拾起那信，他却又走回来。我的心完全平安，态度也冷静。“你若是硬骨头……你不要把这信给任何人看……连你也不了解我啊！”他几乎是凑在我鼻子下面说着。这时山上已经探出了各个人的脸。我还是矜持地故意大声说着：“信既然交给我，我就随我的意处置……”一面看着字迹歪歪斜斜的信……。当他临下山时约我：“我们到山下去谈谈罢……”

“我不想去。”“避免嫌疑么？”他尖锐地笑了。“就是的……”“你也说一句啊……刚才你不是骂我……好使我心安……”这是他将要到山脚时，停在路上，扭回头向我说。等待我回答。“只要你说我不是‘反革命’，我就是不骂你……”我说，还在看他信。“你不是‘反革命’，啊！”“好，我也不是在骂你……”他一直摇摇晃晃走进了田地中，坐在一匹石马上去了。他还向我声明他是个好党员。我说：“我知道。”我回到山上，思量着，觉得这处置是对的，芬却觉得我太厉害了。因为她不明白，不这样处置，如果我像一个朋友那样接待他，那会生出一些可憎恶的谣言，这对我斗争是一种妨碍……我必须要这样无情地做啊！看过他的信，我思量着，竟要和他谈一谈了，我站在半山坡上向他招手：“你请上山来，我们谈一谈……”“你不怕……”他用手拍着自己的脖子向我叫着，“……砍脑袋吗？”他摇晃着走过来。“不要紧的……不至于到这样程度。”我笑着说。“我不是托派呀……我……”“我不知道这些事……”他走到山路口，忽然停住了：“我不上去了，没什么可谈的了……我渐渐明白了，我错了，我不应该把这信交给你，应该交给文抗的支书呀……你交给支书……只许你看，和支书看……不准第三者看……不准……”他又踉跄地从大路跨入了田地。……当我仍回上山来的时候，我听到了一阵轻狂的男人和女人们的的笑声……这是一种残忍而卑贱的笑声……鉴赏一个人底失掉情操的笑声。我憎恶这失掉情操的人，更憎恶这笑声！黑丁、韦莹全是这笑声底参加者。我对这事思量过了，微微感到一点残忍味的后悔，但我确是应该如此做的。我把那信交给了毛泽东的秘书乔木转给他。

(42-10-2)



毛泽东看到这封信没有?如何处置这封信的?《毛泽东文集》、《毛泽东传》、《毛泽东年谱》上都没有任何消息。

10月22日晚上,萧军已经睡下,王实味突然来找他。这样,一个人在窗外,一个人在屋里,有一番对话。萧军在日记中记载:

夜间正睡中间,忽然王实味在门外把我惊醒了,他说:“……我来劝说你,请求你……马上加入共产党,痛痛快快地把自己的错处承认过来罢……不要为了个人的自尊,为了革命的利益着想罢……他们明后天就要讨论我的党籍问题了……我倒不怕他们开除党籍……这样我也不会离开革命工作的……但是我看到十九日解放日报的文章,那后面伏着杀机啊!我倒并不怕死……来哀求你……但为了革命……也许会牺牲了我……我甘愿的……可是叫你转那封信已经说得明明白白了……我的心是为了党的啊……我知道你是对的……你那样响亮地打了他们的耳光……不过他们拿你没有办法……。但是为了革命的影响,这样不成啊……那要垮台……毛泽东是禁受得起这耳光的……我过去错误了……不该乱骂人……你是英雄……是硬的……但我要流眼泪……一切要做人所不能做的罢……”

他蓦然向我诉说了这些事,起始虽然稍稍感到一些不愉快,接着就平静了,我知道他有些事还不知道(他被一些人隔离),我大约告诉了他研究院给我警告书及鲁迅纪念会我讲演等事。为了不乐意和他多纠缠下去,我说:“第一个,我给你的意见就是人无论到了怎样艰难的环境,不要失掉一个为人底自尊,你要好好练习控制你的感情。第二,你的意见我可以考虑,入党与否。第三,你可以把‘杀机’等想法抛开,这不会的,因为现在不是那个时代了。第四,你所说的‘英雄’一类,这是一种夸大,共产党少我们一两个人不要紧,即使再少几个也不要紧。第五,我没什么过错可承认,过去也没做过什么错事,将来也不会。第六,我不愿人强用我,也不愿强用人。第七,我要自尊,也要弄个水落石出……”我一直是睡在床上,他站在窗外,我们就这样大声地讲着。我疑心这也是苦肉计,另外也许有人在听着,但这是无关的。

“即使你开除党籍也无问题，将来你仍然可以恢复……”“那当然……”从他这回答，我更证明了自己推测不错。（42-10-22）

以后的日子里，萧军与王实味仍有交往。

1942年12月15日，王实味又一次找到萧军。在萧军眼中，王实味“他激动地流泪”，“他的神智已经不那样混乱了”，“这是一个有肺病的，神经质的，感觉性强的，聪明的人。”

萧军日记中记载：

王实味说：“我最近才承认了这个党底进步性，容受性是可惊的，我没了怀疑！我过去对党中央怀疑呀，你想一个党员对党中央怀疑，这样算一个什么党员！我这个做党员是不得已啊！我不是这样的坯子，只配写写文章……”“我过去对这党是怀疑的，自从有了毛泽东，这党才有了路，有了光明的方向。对于毛泽东他底政治才能、主张，我是佩服的，只是对他的个人享受欲太大，我老实说感到不满……如果他多像列宁那样……‘刻苦自持’就更好了，病人们全没得吃的啊，而他们……”。（42-12-25）

12月27日，萧军给王实味写了一封信，请他不要再来找他，“这于此时是不宜的，而且也无有必要”。（42-12-27）这封信第二天发了出去。

## 王实味被枪毙了

萧军的抗争，是一个人的抗争。

萧军对王实味的支援，是一个人的支援。正常情况下，这种支援是不会有有什么效果的。

10月23日，中央研究院党委作出《关于开除王实味党籍的决定》。

丁玲是《解放日报》文艺栏的主编。延安整风期间，有人批评丁玲的杂文《三八节有

感》和她同意发表《野百合花》。丁玲做了自我批评，仍有人抓住不放。毛泽东知道了，说：“《三八节有感》同《野百合花》不一样。《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这一席话，救了丁玲。（张春生编著《延河岸边的毛泽东》，第22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1月版）

王实味的文章，引起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他们将王的文章编成《关于野百合花及其他》的小册子散发，对中共及陕甘宁边区进行攻击。

1943年4月1日，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下令将王实味正式逮捕。

1944年3月22日，毛泽东说：如果生产搞得好，《野百合》也许不会写出来了。三年以前大家的伙食不好，病人也很多，据说鲁艺上课有一半人打瞌睡。大概是小米里头维他命不够，所以要打瞌睡。（《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107页）

1945年4月20日，毛泽东说：如果不整风，党就变了性质，无产阶级其名，小资产阶级其实，延安就不得下地，王实味、“轻骑队”、“西北风”占了统治地位，只有经过整风才把无产阶级的领导拯救了。（《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285页）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说：“如果不整风，党就不能前进了。那时分歧达到这样的程度：有一个王实味在延安写了一篇文章叫《野百合花》，很多人愿意看。……当时，很多文化人总是和工农兵搞不到一起。”“当时我们没有东西吃，王实味挑动勤务员反对我们，他像是站在勤务员的立场上反对所谓‘三等九级’、吃小厨房，因为那时大厨房没有什么东西吃饱喝，其实小厨房东西也不多。后来我们用发展生产解决了这个问题。”（《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337—338页）

5月31日，毛泽东在“七大”的结论报告中说：整风前延安出了《野百合花》，是王实味写的。为什么出了这篇东西呢？就是因为我们缺少吃的东西，营养不够，打瞌睡，缺少维他命，因此他就有了资本。现在就没有《野百合花》了，不单是因为经过整风，而且因为物质条件也好了。我在西北局同高岗同志谈过这个问题，我说我们要答复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要从物质上来答复，用发展经济、丰衣足食来答复他。（《毛泽东文集》第三卷，

第406页)

延安整风,在1943年发展为审干运动。7月15日,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社会部部长康生,在杨家岭大礼堂向延安干部大会作了题为《抢救失足者》的报告。报告中点了王实味的名,他旁敲侧击地说:还有人为王实味辩护过。

有人说:康生说的“有人”,就是萧军。

萧军参加了这个报告,他在日记中有记载:在这个会议上,有一个女人揭发说,她的灵魂是如何被王实味蒙蔽的。萧军在日记中预测:如果将来战势紧张,王实味仍顽固不化,他们也许杀了他祭旗。(43-7-15)萧军不幸言中!

1946年,中共社会部对王实味的问题作出结论,将他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

1947年3月,王实味被社会部由延安押往晋西北地区。4月16日,他被送到晋绥公安局第四科关押。6月中旬,晋绥行署所在地兴县遭到国民党飞机轰炸,晋绥公安局提出了处决王实味的请求。据说,当时正在晋绥搞土地改革工作的康生“口头批准”了晋绥公安局的请求。7月1日,国民党飞机又一次轰炸兴县,晋绥公安局地四科驻地也被炸。看守所需要立即撤离。当晚,王实味被就地处决。尽管当时情形特殊,但杀掉一个拿笔写文章的文人(尽管当时认为他是坏人),毕竟不够宽容和大气。

杀掉王实味的消息,可能很快就传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很不满意。

1948年1月15日,毛泽东在米脂杨家沟召开的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说:这次把王实味杀了大为可惜,他是一个坏人,但他还会写文章。(《毛泽东文集》第五卷,第25页)

这年的8月份,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就处决王实味给中央写了一封检讨信,请求处理。他为什么写这封检讨信?肯定是受到“上面”的批评了。

9月1日,毛泽东在李克农的信上批示:“有所声明即够,不必议处。”

## 毛泽东多次谈论王实味

王实味被枪毙了。此后的岁月里，毛泽东多次谈论王实味——最初只是批评，后来有反思，再后来，就好像有些后悔的样子——

1950年7月，陈传刚（即成全）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当年被打成“五人反党集团”是冤枉的。毛泽东批示：五人反党集团并无具体证据，似应予以平反。

不知怎么回事，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没有得到落实。

1958年1月，《文艺报》出版一个特辑，刊登了《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等，进行再批判。毛泽东对编者按作了修改和加写。他写道：“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上。主持这个副刊的，是丁玲、陈企霞。”“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许多人想读这一批‘奇文’。我们把这些东西搜集起来全部重读一遍，果然有些奇处，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鼻子灵的一眼就能识破，其他的人往往受骗。”“感谢丁玲、王实味等人的劳作，毒草成了肥料，他们成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教员。”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19—21页）

1961年6月，毛泽东说：过去中央苏区搞AB团，湘鄂西、鄂豫皖苏区搞好肃反，杀了不少人。延安整风有点经验，虽然出了毛病，但未杀人。后来把王实味杀了，不应当杀。（《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第504页）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说：凡是可捕可不捕的，可杀可不杀的，都要坚决不捕、不杀。……有个王实味，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在延安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题名《野百合花》，攻击革命，诬蔑共产党。后来把他抓起来，杀掉了。那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间，自己杀的，不是中央的决定。对于这件事，我们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他当特务，写文章骂我们，又死不肯改，就把他放在那里吧，让他劳动去吧，杀了不好。动不动就捕人、杀人，会弄得人人自危，不敢讲话。在这种风气下面，就不会有多少民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第40—41页）

1962年9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说：“写《野百合花》的王实味，是不应当杀的，可以让他做点技术工作嘛。”（《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第156页）

毛泽东说“不应当杀”的知识分子，还有一个是在1927年湖南农运时期被杀掉的叶德辉，湖南老乡。叶德辉，凡四部要籍无不搜罗，藏书近三十万卷，著述有《书林清话》等。1968年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毛泽东脱稿说道：“这个保孔夫子、反对康有为的，此人叫叶德辉。……情况我不大清楚，因为我不在湖南。对于这种大知识分子不宜于杀。那个时候把叶德辉杀掉，我看是不那么妥当。”（刘诚龙：《想来还是学问长》，见《书屋》2014年第7期）

毛泽东这一生，反复说王实味。可能在知识分子中，王实味是毛一生点名最多的一个人。

## 给王实味平反

1982年2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作出《关于潘芳、宗诤、陈传刚（即成全）、王汝琪（即王里）四同志所谓“五人反党集团”问题的平凡决定》，决定给潘芳、宗诤、陈传刚（即成全）、王汝琪（即王里）四人平反。惟独没有给王实味平反。

1991年2月7日，公安部正式作出《关于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决定说：“经复查，王实味同志1930年在沪期间与原北大同学王凡西、陈清晨（均系托派分子）的来往中，接受和同情他们的某些托派观点，帮助翻译过托派的文章。在现有王实味的交代材料中，王对参加托派组织一事反反复复。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凡昭雪。”

人都死了，骨已朽矣，平反昭雪，意义几何……

公安部的《关于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中说，“在现有王实味的交代材料……”。可见，当年王实味的档案材料仍在。如果公开，可能就有些“意义”了。

毛泽东曾说：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有正统，也有若干不良的习惯即“某些错误的传统”（1937年6月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搞“残酷斗争”、有时不太信任

知识分子，大概属于“某些错误的传统”。

### 多余的话……

王实味这一生，文学成就并不太高。《野百合花》之前，他的文学成就不算高；《野百合花》，只有“讽”的意义，如果算是文学作品的话，它的水平在文学大海的海平面之下。《野百合花》之后，作者已经没有什么机会进行创作了。

因为政治弄人、弄文人，王实味和他的《野百合花》却成为谈论中国现代政治和文艺时，让人不得不谈的一个人和一个作品。一个不出名的作家因为一篇不怎么出色的文章而被杀，一个不出色的作品出名因为非关文艺而出名，这……情何以堪……■

【述 往】

### 镇反纪实（一）

## ——缘起

王丕忠

### 一、留用

“留用”，这是大陆解放后，共产党掌权初期形成的一个新名词。指原国民党政府机构的职员在共产党接管后仍留下并被任用的缩略词。这批人都是中下级职员，既非军政要员，又非资产阶级，都是走投无路靠工资糊口的可怜虫。

1948年秋后，解放军在东北节节胜利，国民党军队溃退入关。至1949年春，解放军一路追击到了徐州地区，掀起淮海战役。这一战役地当要冲，关系全局，经双方激战，解放军又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国民党军队丧失斗志，溃不成军。局势急转直下。

我当时在国民党政府财政部下属上海市直接税局任职。我进入该局丝毫没有依靠人事关系，是通过财政部办的财务行政人员特种考试录取，再经过训练班后进入的。这种员工称为考训人员，属财政部的基本职员，不受主管人事调迁或机构变动的影响。

在国民党政府岌岌可危之际，税局的内线人物中平时和我接近的人曾对我说：情况已危急，当局已作迁往台湾的准备，如我愿意同走，可为我联系，嘱我早作准备。我便问可否带家属，他说：“不行，要走的人太多。交通工具不足，只好本人先走，家属容后再说。”

我当时心乱如麻，一时决定不下，只说让我考虑后再答复。经这谈话，我思潮澎湃，寝食不安，心想如果放弃税局的职务再向何处谋生？如随局方去台湾，那末双亲已年迈，留在大陆谁来瞻养？考虑到这一点便决定不去台湾。此外还有一个看法，认为国民党腐败无能，纵有几百万军队却保不住大陆。今后逃到一个小岛，靠少数土地人口和军队更不能坚守。何况国民党不得人心，恐怕台湾人民也会起来造反，决不能长处久安。我如随着局方去台湾，可说是自趋绝路，台湾一旦被解放更去何处？我平生虽不进步，却从无异行，



从未干过反人民反革命的勾当，解放后留在大陆，想也不至有问题。考虑到这一点，留下的决心从而更坚定。

1949年初夏，上海市解放了，我怀着既喜悦又惆怅的复杂心情来迎接这一历史的转折。喜悦的是过去乱七八糟的政治局面结束了，一个崭新的景象展开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个人都有机会学有所用，致力于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结合着国家利益的增进，个人利益也可随着增进，民富国强的前景正在向我们招手。过去的政治不安定，职务不安定，物价不安定，生活不安定，思想不安定等等情况，渴望一去而不复返了。惆怅的是我本人在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创业中，一点也没有出过力，全仗共产党、解放军以及进步人士的努力，非但扪心有愧，而且在我个人经历中缺少光彩，与人共处，相形见绌。

我们这一批留用人员，经新来的当局派到学习班学习。这期间，除学习革命理论、党的政策、业务知识外，还须个人表态，而且所有的人都要通过极为严格的资历审查，然后逐个分配到新的工作岗位。当时税局的名称已改，我被分配到另一处工作。当时就想，过去的事过去了，而今职位已定，一切从头开始，以后振作精神好好工作，争取光明的前途。

综上所述，说明我原先对国民党并没有好感，相反对共产党却抱有幻想，认为共产党有一定的优越性，可望它扫除资本主义的弊端，给人民带来幸福，使社会走上进步。可是后来它所执行的种种政策和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以及其引发的无数骇人的事端和恶果最终使我的幻想破灭，思想走向相反方向，这一转变完全是客观造成的，并没有成见在起作用。

## 二、积极分子

我自1949年秋开始在新岗位上工作。当时同事大多数是留用人员，彼此还能相安无事。可是过了不久，陆续调来了一批新干部和青年，这些人被局方誉之为“积极分子”，表扬他们思想进步，工作努力，被称作骨干，并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

当时我的顶头上司谢某就是这样一位骨干。这人偏见极深，独断专横，把留用人员视

同“俘虏”。他时常召开“积极分子”会议，留用人员不得参加，会议内容保密，外人不得而知。从此留用人员处处受到歧视和压制，一切唯有听命，没有发言权。在工作和生活中即使有意见，甚至有气恼之事，也只有忍气吞声，敢怒而不敢言。留用人员难免私下发牢骚出怨言，但很谨慎，非常注意谈话的内容和措词，唯恐泄漏出去触犯当局。同时“积极分子”无时无刻不在暗中侦查留用人员的言行。有的甚至故意向你表同情，引你说出“反动言论”，然后暗中告发立功。就在这样的场合，有一次我出于愤慨失去了警惕，无意中说了一句较有分量的话：“看来我们好像不是被解放者，而是被征服者。”

当时没有人接我下文，一时冷场，更显得我这话突出而引人注目。我立刻意识到失言，但话已出口，收不回来，后悔莫及，忐忑不安，一连好几天懊恼万分，唯恐因此招祸。但事后未见动静，思想稍安。然而是否就太平无事，很难断言。

当局的作风，对于所谓“内藏的敌人”和“可疑的对象”不采用打草惊蛇的方式，而是暗中侦查，收集材料。到了适当时刻突然袭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至于所搜集的材料，是否真实，置之不顾，否则积案如山将无法处理。办案人员为图塞责和立功，甚至捏造案情，绳人于罪。想到这些令人心寒。至于我这番话是否被告密，是否已写成材料存进档案，不得而知。从后来对我的迫害步步升级，以至被逮捕判刑，看来可能与此有关。

留用人员一旦被注视且片面定性为反革命分子，将难以脱身。司法机构也以“一切敌人难逃人民法网的巨掌”的口号自豪自诩。总之当时在恐怖不安中工作和生活，实在不堪忍受，可是一时也无法可想。

有一次处里开会，是为布置一项紧急任务。会议中积极分子提出了很多意见和措施，但是没有人提到应做出法制上的规定。于是我便提出了这一点。出乎意料，当时立即遭到积极分子们的围攻，说我没有立场，我的主张会泄漏政府的机密。这样的帽子扣下来使我不敢辩解，知道这是徒然的，只有增进矛盾，扩大事端。当时会议由谢某主持，他一向偏袒积极分子，歧视留用人员，但这次却一言未发。按我体会我的主张是符合政策的，是理所当然的。一批积极分子文化不过初中，年龄不过二十，只知高呼万岁，积极响应号召，

知识是极浅薄的。谢某当然也了解这一点，因此没有在会上明确表态，没有站在积极分子一边来攻击我。可是对我随后的苦难经历来说，这是开端。

这件事后，与我较为接近的留用人员私下说我太暴露思想，劝我要注意。我当时颇不以为然，心想表达个人的思想是人之常情，我又不是阴谋家或间谍，为什么要隐瞒自己的观点？事实上这人是好意，只是我当时对自己处境的险恶认识不足，与谨小慎微，明哲保身者相比，可说是愚蠢，可说是不识时务。可是生性如此，也难以改变。

1949年冬，政府发行折实公债，局方号召职员们认购。有一天我工作的部门召开全体会议，进行认购。与会者有几十人，其中半数以上是积极分子，由主管谢某宣布认购办法：先由个人自报，经公议通过，然后把认购数额登记下来由认购者签名。当时我应认购多少，心中实在没数。而且由于经济极度困难，实在无法负担过多，想先看大多数人认购多少，我就随大流也认购多少，总不致太离谱。

认购开始了，谢某问：“谁先开始认购？”话音刚落立即有人提议由我先认购。看来这是事前布置好的，这是他们的一贯作风。不少人便喊：“同意。”

这下把我的打算打破了。我便说：“我不知道应该认购多少，少了不合适，多了我负担不了，还是请别人先认购吧。”积极分子中有人便说：“如果别人也和你一样想法，那末谁先开始？至于多少问题，越多越好嘛，遇到好事应该见义勇为，不要推让了。”我一时说不出话来，其他人也不作声，一时冷场。

谢某开腔了，对我说：“你在此年龄比较大，就不能起个带头作用吗？”口气十分严峻，事实上等于命令，使我十分反感。我早已略知这谢某的来历。有知内情的人曾对我说过，要提防这人。他原先是共产党员，后来脱离了党的关系很久，现在解放了，又来参与工作了，是个投机分子，不少人吃过他的苦头，提醒我要多留意。我想到这一点，不敢和他顶撞。又想早认购晚认购总是要认购，而且我如能少认购那更好；如认购多了，别人也不至于过少，早点过这一关，好早点放下思想包袱。于是，我略加思索便说了一个数目，在印象中这是我当时很大的负担了。哪知刚一出口，便有人接口：“你就认购这么一点点？我们

知道你是很有钱的，你至少认购×××份。”

那时一份折实单位约值六千元左右，即相当于钱币改革后的六角钱。我便说：“我确实很困难，没有钱。”“谁相信！你犯的是资产阶级的通病，自私自利，一毛不拔。”这人的话音刚落，其他积极分子就七嘴八舌地对我指责，一时乱哄哄，也听不清在说什么。我怒火中烧，但尽力克制，回过头来问谢某：“认购折实公债到底是自愿的还是强制的？”

在这当口我头脑已混乱，分不清言重言轻，也考虑不到对自己的不利影响和后果。忍耐和克制在极度愤怒下是难以做到的。

谢某不回答，也不看我，只是冷笑了一声，然后对积极分子和登记认购数字的记录人员说：“随他去，他一份不认购，共产党、人民政府也垮不了台。”

他这样地说法好像我是在抗拒认购，企图政府垮台，恶毒至极。我受到这样一连串的污辱和诬蔑，气恼已极，真想一份不认购，立刻离开会场。可是想到我是一个无告的人，而且在政治威力控制之下，如果真被扣上破坏认购折实公债活动的大帽子，后果不堪设想，从而心中害怕，不敢走极端，尽力地忍耐等待。其他的人进行认购了，进行得很快，绝大多数人认购同一数目，好像是预先商定的，是个二位数。而且在自报公议进程中只有自报，公议只是形式，大家都是只喊一声“通过”便了事。最后记录问：“还有人没有认购吗？”我说：“还有我，也认购××份。”

记录不敢记，看看谢某，观察他的脸色，谢某只当不知，置之不理。我便催促记录记下。他看谢某并无表情，便记下了我的姓名和认购数。最后谢某作了些指示后宣布散会，会议就这样结束。我怀着愤怒、恐怖、懊丧、迷惘的复杂心情，无精打采地离开会场，脑海中痛苦地思量着一个迫切的然而却难以解决的问题：“这样的生活我怎样过下去，我该怎么办？”然而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我的悲惨命运由此深深地扎根，正在前面等待着我。

### 三、准备赴港

从此以后我的处境就更加困难了。工作中经常受到批评指责，无理取闹，并把我调去干外勤工作，调查各厂家的生产和营业状况。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个阴谋，有意调我外出，以便暗中侦查我的行动。有几次我发现有人在跟踪我，但我并不害怕，只是气恼。我不是特务间谍，没有越规行为，没有犯法活动，不怕侦查。

一次有人在马路尾随我，被我发现，我不逃避反而转身去追他，他迅速逃窜，不知去向。又有一次夏夜我在中山公园乘凉，听到身后树丛中有人，走过去一看，只见俩人影，他们发觉我走近便立刻避开。有一次我寄信，在邮局买了邮票正往信封上贴时，身旁一人出奇地注视我的信封，引起我怀疑，信投入信箱走出邮局后，我觉此事蹊跷，又进邮局想看此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可是看不到此人，猜想他已进入办公室，要求邮局开箱取出我寄的信来检查了。我那封信是无关紧要的，随他们去检查好了，我大可不必为它多伤脑筋。对此种种我并不恐怖和胆怯，而是愤怒和烦恼，精神上受到难以忍受的折磨，无从摆脱，日子实在难过。

同时在生活上入不敷出，愈来愈困难。别的职员陆续定级定薪，而我的工资却原封不动，只发给“生活费”，约 120 个折实单位。除维持本人生活外还要负担家庭，在困难下不得不靠举债度日。可是那时至亲好友也无不在困难之中，自顾不暇，确实无力帮助别人。

正在这时，我左胸忽然膨胀，左乳部位生一硬块，逐渐增大，又痒又痛，夜不成寐。到医院诊治，打针几次后未见效果，且费用很高。转中医看，据称此症是由于心情抑郁，气血不顺所致，开给我药剂和膏药，过了约半个月居然痊愈，其后也未复发。

这可说我当时不幸中的大幸，否则贫病交迫，不堪设想。但是肉体上的痛苦虽解，精神上的痛苦仍在，且与日俱增。一次一个与我相熟的同事，他是共产党员，能参与内幕，告诉我：局方曾打算开我的批判斗争会，因王处长表示不同意用这方式来教育我而未决。这会虽未开成，但给了我一个信息，即他们开始要用强硬的手段来对付我了。

在身心双重煎熬下挨到了 1950 年冬天。有一天在电车站碰见大学时的同班同学张某，他刚从北京回到家中。他由于在北京某机关任职中受到排挤和歧视，愤而离京。于是我把

我的情况向他一谈。正是处境相似，同病相怜。在多次会晤后，谈到彼此今后的出路问题，二人都感到在这个新政权之下是难以生活下去的。极端的政策，政治的偏见，使具有民主、法制、人权观念的人无法适应。我二人那时所考虑的只是个人出路问题，谈不上政治观点和企图。他告诉我，大学时代曾在经济系执教的一位美籍教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担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远东方面负责人，解放后总部由南京迁到冲绳，在香港设有办事处。燕京大学经济系的同学中已有几人在这些部门中工作，他也打算要去，要我考虑是否愿意同去。我当时实在不能在税局继续工作下去了，经济上又濒临绝境，如不铤而走险，出去闯一下，别无其他出路。在逼上梁山的形势下，决定和他一起去香港。

解放初期，大陆有很多人想逃避现实，投奔境外，香港是最近最方便的目的地，路费既少，又无需证明和签证。政府对此并不禁止，而且规定出了居民赴港的手续和办法。我恰好有近亲表姐夫妇在九龙元郎经营家禽生意，营业很兴旺，解放前曾一再邀我陪伴我母亲去港在他们家暂住，游览港澳各地。我如去港就可以他们家作为立脚点，再图出路，目的仍然是想借美籍教授之力进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

赴港之事一经商定，我便回苏州家中探望双亲，说明了情况，对我离开后家庭的生活略作安排，并留下了除赴港的川资外仅有的余钱。以后瞻养的责任只好暂时落在我哥一人的肩上。至于一家人如何去克服困难，也无法考虑周到，只好等我在外闯出生路后再说。

在家中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与双亲告别，乘早班火车回到上海。一回到宿舍就发现我的东西被人翻动。我便问看屋子的工友有谁来过，他先不敢说，经我追问，才吞吞吐吐地说：好像是有两个人来过。我对此已不以为怪，早知我是在被监视之中，时时有人在侦察我，跟踪我。解放以来，政府防特、防反革命活动的措施无所不用其极，报纸上经常登载破获反革命案件，不断有人被处决，真相如何不得而知。

以我为例，即被认作反革命特务嫌疑，专政之下，无理可言。由于无法律保护，人人自危。我生性比较胆大，而且既已决定远走高飞，脱离苦海，对这些触目惊心的消息也就不很恐惧，但也不能无动于衷。回顾在一年多的短暂时期中，我在工作上生活上没有做到

唯命是从，更没有做到表现积极，不是由于不能而是由于不愿，有时还要表达自己的意见，从而暴露出在观点上不免与当局有差异或相左。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不把我看作特务搞破坏，至少也要被看作是阶级异己分子。容我这样的人存在，是专政的障碍和祸根。接踵而至的“镇反”、“三反”、“五反”、“肃反”、“反右”以至“文化大革命”，名称虽不同，实质则一，都是要铲除专政的障碍和祸根。

#### 四、被捕

1951年新年过后，我便着手做赴港准备。卖掉了收音机、手表、衣服等作为路费，怕不够又向朋友借了一些，凑了为数不多的钱。再多也筹划不到了，估计路费已够。好在到香港以后可寄居在表姐家中，总不至流落街头，至于以后怎样就顾不到了。当时政府并不禁止居民赴港，凡要赴港者可申述事由申请通行证。探亲是种种事由中最为普遍最为简单的事由。我既有表姐在港，又有她的地址，就准备以探亲为事由，通过正常手续申请通行证赴港。不料，我和大学同学的赴港计划遇到了节外生枝。12月中旬有一天我俩会面时，他说他妻子在北京娘家，一时不能回来，他必须先去北京一趟，和他妻子商议一下，征求她的同意，并筹划川资。我虽急于成行，但一想这事对他来说也是必不可免，不得不耐心等待他赴北京回来后再启程。

到了十二月下旬，我到人事室去谈我因健康原因不能继续工作，请准予我辞职休养，待健康恢复另找工作。人事室说：政府没有辞职的规定，你如有病，可到公立医院去检查，开具证明，局方可以给你开病假。我碰了钉子怏然而回。心中盘算，如不辞而走有何不可。继而一想，我已被监视，如不按正规手续办理出境，会出问题，可能认为我潜逃而逮捕。还是慎重从事，不可冒失。1951年1月底，我突然接到通知，叫我到人事室去一趟，我立刻预感到不会是好事儿，但未知究竟，只有硬着头皮去看是什么事。人事室离我办公地点不远，便步行而去。一路上心情紧张，忐忑不安。留用人员因无法律保障，随时有祸从天降

的可能。我既然已被监视作反动的典型人物，这种可能性更大。临近中午来到人事室。

“通知我来是为什么事？”我问。“你不是想要辞职吗？”接待我的人反问。“是的。”我说：“因为我身体不好，有病，这里的工作太繁重，我顶不住，曾有过想辞职另找工作的打算。总局人事处叫我去公立医院检查，出具生病的证明，可以请病假休养，但不能辞职，局里没有这种规定。”

“你用不着去检查了。”他说：“局方经过考虑，满足你的要求，准许你辞职。这儿是你的辞职批准书，你可到会计科去领取这下半月的工资。”

这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原以为这件事要费很多周折，想不到却解决得这样爽快。于是立即去会计科领了十二月份下半月的工资约 40 万元，这是从 60 份折实单位折合人民币的数，是解放初期的币制。在币制改革后，以一万作一的比例计算，约合 40 元。我从会计科出来正要走出大门，即被门卫拦住，不让我出去，说是局中正在开会，不许人进出，需等会开完后我才能走，并叫我稍等一下。我顿时生疑，因为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我立即返回人事室，责问为什么门卫不让我出去。他们叫我等一下，去找主管来见我。过了几分钟，主管出来了，对我说门卫不让我出去是出于误会，并已通知门卫放我走了。我因中午还有约会，急于要走，也就不去管它是怎么回事，匆匆走出大门，打算乘车去会一个亲戚一同吃午饭。哪知刚走离大门约 100 米，身后有人拍我肩膀，我回头一看是两个陌生人，身穿中山装，其中之一面目狰狞，异乎寻常。“你们干什么？”我便问。“跟我去公安局走一趟。”“什么事？”我又问。“你去了就知道了”他俩答。“我今天有事没空，不能去，明天再去。”我说。“不去不行，你被捕了。”

他俩说时拿出一张逮捕证给我看，上面姓名栏中是我的姓名，案由栏中是赫然“匪特”二字。这真似晴天霹雳，一下把我震懵了。我略定一下神，急躁火爆地说：“没有的事，胡闹，你们随意抓人，我不去。”“你非去不可，我俩是执行命令，有话到局里去说。”

随后一人掏出手枪指着我，另一人把我上了手铐。接着后面开来一辆黑色旧汽车，他俩把我强制押上汽车。我因过于激动，大声抗议。



公安局就在附近，一下就到了。我被押下车，他们连推带搯地把我押进一间小房间，其中只有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一进门便推我坐在一把椅子上。同时从外面又进来了几个人，拿着纸张墨水和蘸水笔放在我前面的椅子上，对我说：“你要知道党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把你的身份、组织、犯罪经过、目的、计划、同案等详细据实地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否则死路一条。”

我听了怒不可遏，头脑发胀，站起来大声说：“我决非匪特，没有什么好交代的。你们就这样诬蔑人、压迫人吗？”他们又推我坐下，厉声说：“这样就算压迫你？压迫还在后头，你等着瞧吧！你还不老实？快写！”“不写！”我大声说，随手把纸笔墨水瓶等使劲扫在地上，他们中一人走过来，一巴掌打在我脸上，激怒之下，我用尽全力一拳回击，打在他身上。其他几个人立即对我围攻。我也拼命抵抗，拿出我少年时代学的招数尽力自卫。一时桌翻椅倒，乱作一团，终因寡不敌众，又因病后体弱，远不是他们对手，受到拳打脚踢，站立不住，栽倒在地上。在倒下时头部撞在墙上，只觉金星乱闪，陷入昏迷状态，当时仍未完全失去知觉，但浑身疼痛，不能动弹。他们七手八脚的抽掉我的裤带，解去我的皮鞋带，搜去我的东西，如钱、日记本等。我完全失去抵抗力，只有任凭他们摆布。最后把我抬到看守所，投入铁栏之内。我不能站立，躺倒在墙角，不久便失去知觉，是昏迷还是入睡，分辨不出。

我生性倔强，虽遭此变故，备受凌辱，却没有哀叹自己命运悲惨的想法，情绪并未颓丧。但是，我对前景的艰难险恶，至此已深信不疑，看来是一段望不见尽头的历程，怎样走完不堪设想，只有去硬顶，但不知将伊于胡底。■

【述 往】

## 追忆三线“五·七”厂（二）

马昌海

### 正式成为产业工人的一员

1972年夏季过后，我终于分配了正式工作：细纱车间保养工，常白班。发了一条背带裤和一顶帽子。看看我领到的工具，就知道我是做什么的了：两个油壶，塑料壶装锭子油，长细嘴的铁皮壶装机油；一个装着工业黄油的小铁盒；三把刷子；一根1米多长的细竹捻棍（用来清除附着在细纱机底部隐蔽处的棉花毛）；几块破布；一把锥子；一个小扳手。名为“保养”，其实就是个清洁加油工吧。所谓细纱机保养工，就是在细纱机运转数月后，拆开细纱机用于牵引、延伸粗纱的三根细细的长轴（术语：罗拉），擦干净，抹上油再装回去。还有皮辊、锭子盘等部件的清洁和加油。这工作毫无技术性可言，只要手脚灵活就



可以。保养一台细纱机需时一个半小时，每天上下午各两台。因为是要求六个人在组长的指挥下协同一致动作，一个人的动作慢了，就会引起他人因等待而造成的不耐烦。所以我每天都有6个小时是在恶劣的空气和噪音环境里，弯腰撅腩、手忙脚乱中度过。刚开始很不适应，（上图：1972年9月在府河边）每天下班都腰酸背痛，疲惫不堪。当初从草原来安陆当工人

是怀着学一门技术的憧憬，以以实现加入伟大工人阶级队伍的理想，却没想到当个工人这么辛苦。还是在草原信马驰骋自在啊。我常感到自己反而成了细纱机的附属物，面对高速运转的庞大机器无可奈何，恨不得砸烂这个A512细纱机以求解脱。多年后，在大学历史系学到英国工人运动初期以捣毁机器为特征的“路德运动”和“斯温暴动”，不禁想起了我

自己当年的真切感受。

细纱机保养用纺织行业的上海话发音是“揩(ka)车”(擦车)；保全叫“平车”(把机器拆开重装)。上海是老纺织基地之一，所以纺织行业的好多传统术语都是从这里流传下来的。在“五·七”厂的各车间，保养和保全都是合二为一的，保全工按照计划进度，既“揩车”，也“平车”。唯独在细纱车间，保养工和保全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工种，前者是熟练工，后者是技术工种。但工资待遇却完全一样，都按照四类地区轻纺行业技术工种的标准发放。学徒工第一年月工资 22 元，第二年月工资 24 元，第三年月工资 27 元，第四年转正，一级工月工资 31 元，第四年转为二级工，月工资 36.3 元。1974 年我借“批林批孔”运动还就此写过大字报，认为细纱“揩车”就是熟练工，为什么要按照技术工种的标准发放工资？细纱车间的熟练工种，第一年的月工资就是 29 元，第二年月工资 38 元。结果回答是：细纱车间的保全工，一般都是由保养工转来的。再问：为什么不能等以后真的转成保全工了，再重新调整工资？不予回答。

那个年代厂里食堂的伙食极差，有时一个月也见不到肉。为了改善伙食，与李南央所在的“陕汽”一样，厂方也逐渐开始偷偷用国家调拨的钢材等计划物资去换猪肉。有一次在河南某地做交易，为了掩人耳目，天黑以后才装车，然后做好巧妙伪装，连夜开车回程，昼伏夜行，以避开路上的检查。结果回到厂里卸车才发现，一片片猪肉都是被割去了瘦肉的肥膘。显然是对方利用黑夜装车，事先就做了手脚。瘦肉的价格当然高于肥肉，对方这样做，等于是又赚取了一笔差价。食堂只好将一车肥肉存进了冷库，以后再分批取出来熬成猪油，慢慢炒菜用。这就是厂里食堂为什么要建一个冷库的原因。七千多职工和家属的单位，后勤保障工作一定要做好，需要保持最低限度的猪肉储备，细水长流。

伙食不好，大家只好动手动脑的自己想办法。在这方面，我们可比李南央所在的“陕汽”要高一个档次。与老乡换鸡蛋、菜油是一样的。但湖北毕竟是鱼米之乡，比陕西岐山那个山沟里要富庶，天天吃大米白面。农户普遍大量养鸡。鸡蛋最便宜时 6 分钱一个，冬天 8 分一个。一斤粮票合一毛钱。“腺鸡”(被阉割后的公鸡)7 毛钱一斤，母鸡 9 毛一

斤，最鲜美的甲鱼最初是三斤粮票加五毛钱一斤，合 8 毛。但很少遇到，后来也涨到 9 毛甚至一块钱一斤了。

每到周日的清晨，天一亮，厂里的人们就像出窝黄蜂一般涌向只有一条马路的安陆街头。这条街还是有了“五·七”厂以后才兴建的。“五·七”厂数千职工和家属的到来，提升了县城自发农贸市场的物价。人们几乎是见什么抢什么：鸡、鸭、鱼、蔬菜……，出手稍慢，或者起晚了，就只好买几个鸡蛋怏怏而归。

满载而归后怎么做熟？凡是 20 世纪七十年代当过工人的，恐怕都熟悉一个词汇：“干私活”，就是利用国有企业的设备和原材料制作私人用品，比如精美的台灯和落地灯。很快，就有人模仿买来的煤油炉，开始自己制作煤油炉。尽管烟大火苗发红，煤油燃烧率不高，但也马马虎虎能对付着用了。自己制作电炉就更容易了，但最好不要超过 1500 瓦。由于电炉的普遍使用，青工宿舍楼经常跳闸断电，大家都备有保险丝，马上就会有人接好。前纺车间青工宿舍楼的保险丝甚至被人换成了铜丝或铁丝，烧得通红！

每个周日都要忙活到中午，我们才能开始享用难得的菜肴。啤酒极少有，喝了点白酒，大家就会开始发牢骚，慢慢地也敢发泄对文革和现状的不满了。一顿饭常常会吃到下午两点，酒足饭饱之后再美美地睡上一觉。晚上去食堂买点米饭，把剩菜打扫一净，刷锅洗碗收拾放好，再期待下一个星期天。

当了两年工人后，大家都学会了做几样菜，尤其是烧鸡鸭和鱼。离开湖北很多年了，一直认为那里最好吃的东西是鳊鱼和甲鱼，味道鲜美。

厂里最早盖起的几栋单身宿舍楼，后来修了围墙，作为男人不得随意进入的女工宿舍。男工就以车间为单位住在家属楼里，最小的厨房只住一个人。大房间最多可住五六个人，上下铺。刚刚进细纱车间的时候，我们三个人蜗居在一间 6 平米的小屋里，真可谓是“鸽子笼”。记得厂方多次调整宿舍，折腾人。有一次，青工们在 40 多度的高温酷暑之下被逼着搬家，只见楼前和路旁，到处是五颜六色的杂物，怨声载道又无可奈何。我记得王学东就此发牢骚：我们没有受过旧社会的苦，却受过“五·七”厂的苦。我们在“五·七”厂受

过的苦，当然不仅仅是在高温之下搬家吧？

## “五·七”棉纺厂人员构成及其相互关系

“五·七”棉纺厂是在征用了安陆城关镇东北角原砖瓦厂的地皮兴建的。全厂四千多职工，加上家属七千余人。不包括一直留守在“五公里半”和“六公里半”农场，没有到工厂工作的下放干部和工人。厂级各科室，各车间、下至工段长一级的干部，基本上都是原纺织工业部和纺织科学研究院及纺织设计院的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

1970年8月，150多名上海华东纺织工学院（中国纺织大学，即现在的东华大学）69、70届大学生被分配来厂；另有一批北京化纤工学院（即现在的北京服装学院）的大学生被分配来厂，都是从普通工人做起。后来随着一些干部陆续调离，仍留在厂里的大学生才逐渐接替了技术和管理的一些岗位。

厂里不多的老工人师傅由郑州及石家庄等地调入。他们中有一些是江浙一带的南方人，是支援内地建设到北方的，愿意借此机会来湖北鱼米之乡，同时也可以解决子女的就业问题。有的老师傅担任了工段长和车间副主任。此外，工段一级还有少数复转军人，其中也有奸诈之徒，如细纱车间四工段的书记张全顺，就遭到全工段几乎所有青年工人的厌恶。一个安陆籍复员军人吴国安，在厂劳资科负责调配工作，很多办理过调动的职工都受尽了他的刁难。此人突患急症去世，一群人立即冲入将其家，将缝纫机之类的贵重物品洗劫一空。看来其生前大概是接受了不少贿赂。

我对工人阶级的认识也和李南央一样，是自己成为工人的一员后，才有了切实的感同身受。工人老师傅中当然有不少淳朴善良的人，但文化水平普遍偏低。也有少数刁钻之人。其中有的人，对拿“高薪”的北京干部不免心生妒意。这其实也是那个年代干群关系、知识分子与普通工人双重关系一种曲折的映射。

人数最多的青年工人群体，大多是原先在孝感和黄陂等地区下乡插队的，以武汉知青

最多，还有不少孝感、黄陂人，一些汉川、黄梅知青。当然，也有一些借知青招工之机，搭车进厂的农村社队干部的亲戚子女，以安陆本地居多。

青年工人中有的原北京和武汉学生有优越感，自以为是大城市来的，把湖北其它地方的人视为“乡里人”。这些乡里人中最善于钻营的是黄陂人，人数不少，能量较大，乡土观念重。他们常常拉帮结派，相互提携，占据了一些较好的岗位。这大概也可算作是一种生存之道吧。1971年6月，“五·七”棉纺厂革委会一成立，就有一位黄陂姑娘杨腊梅作为青年工人的代表担任了副主任，后来又就任厂党委副书记。上述细纱车间四工段的张某也是黄陂人。

1969年最早来安陆的上百名原北京学生，是躲过了上山下乡的一批人。他们是在“五·七”农场从事基建和农业劳动一段时间后正式进厂当工人的。后来还有70届及其后的不少原北京学生在农场劳动后陆续进厂。

1970年以后，陆陆续续有百余名原北京知青从天南海北、四面八方来到安陆，在“五·七”农场劳动后进厂当了工人，我就是其中之一。

一般而言，从北京来的干部有很多是工程技术人员出身，又在国家机关从事行政和技术管理多年。他们工作认真负责，对业务精益求精，重视知识和技术，管理严格，使得“五·七”棉纺厂在20世纪七十年代成为全国纺织战线的一面旗帜。有一个织布车间女工还于1975年1月去人大大会堂开会，作为第四届全国人大湖北团的代表受到李先念副总理的接见。

四千青年聚集在一起，年轻人火气大，青春的激素勃发；文革中和农村里流氓无产者习气的耳闻目濡，加上湖北民风强悍，喜欢“斗狠”，最常见的口头禅就是“么样啊”（你想怎么着或你要怎么样）？就难免会发生种种纠纷和冲突。在食堂买个饭，由于挤撞，就可能引发争吵甚至动手。由于厂方的严格管理，打架斗殴的事情一经发生，就会严肃处理，所以不多。有一个武汉籍杨姓炊事员，因多次参与斗殴和赌博，被厂保卫科送到由县公安部门授意设在安陆火车站的拘禁点，被那里的一些装卸工天天虐待取乐，被打得浑身是伤。

“五·七”厂食堂的管理干部觉得这样长久下去也不是个事，就去把他接回来疗伤。这个炊

事员看到北京干部来接他时，抱着干部的腿嚎啕大哭，看来是受尽了折磨。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无法想象：在文革那样一个无法无天的岁月，全国许多地方都有一个叫“群众专政指挥部”的机构，协助公安部门工作。有不少人被送到那个地狱里整天遭受毒打和折磨。

在青工中也发生过少数恶性案件。细纱车间一个武汉籍谢姓辅助工，平时喜欢“斗狠”，与当过厂食堂炊事员的、细纱车间另一个黑胖粗壮的孝感籍壮工，经常发生冲突。谢某有一次上夜班躲在五六层楼高的大车间房顶睡觉，孝感籍壮工见状就一下子将其掀下了屋顶。夜半，北京学生、电工宋晓红路过车间大门，看到谢某躺在血泊之中，便连忙将其背到厂医院抢救。谢某从此陷入昏迷状态，神志不清。孝感籍壮工随后调离“五·七”厂，回了老家。没想到谢某在两年之后醒了过来，说出了事情的经过。结果这个心黑手狠的孝感籍壮工才因此而被逮捕法办。

北京干部的严格管理，甚至涉及到了青年工人的生活习惯。湖北夏季酷热，一些小伙子下班以后在公共场合也穿着运动短裤和拖鞋。有一次厂里放电影刚刚散场，在夜幕下的人流中，我看到一个操着普通话的干部在厉声训斥一个青工：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太不像话了！成何体统？你是哪个车间的？这个青工在连珠炮般的责问之下，只是诺诺地用湖北话连连辩解：“这有么事”（么事：什么）。他大概想不到这也有人管。

“五·七”厂是个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建立才数年，人员构成也很特别的新企业。1974年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使得厂里潜伏的种种问题和矛盾，都一下子显露出来了。不管是老工人还是青工，也不分什么北京的或湖北的，不少人纷纷贴出大字报，发泄自己所属群体或个人的不满。我也写了大字报，诉说对细纱保养工资待遇的意见。我们还把厂劳资科科长叫到车间里，对其当面质询。

少数老工人更拿出文革中造反派搞大批判的劲头写大字报，刷标语口号，捕风捉影，上纲上线。有个老师傅还戴着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奖章，在大食堂前发表演讲，攻击厂里的北京干部，再现了文革场景。

一个管理食堂的北京干部为了丰富全厂职工的文艺生活，多次请老战友属下的部队文

艺宣传队来厂里演出精彩节目，受到职工们的热烈欢迎。结果有老工人据此贴大字报，说他拿厂里的钱招待部队文艺宣传队大吃大喝，还污蔑他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从此，厂里就再也没有请部队文艺宣传队来演出了。

批林批孔运动的内容之一是批“走后门”。北京学生如果进厂较早，有不少安排了较好的技术工种。但上运转班早中晚三班倒的也不少，尤其是女工。一个9级干部的大公子，父亲的“问题”悬而未决，十多年都是运转班的辅助工。同样，有几个部长的子女，都是上运转班的。其中的一个后来调去开吊车，引起湖北青工的强烈不满，还被贴了大字报。当地青工对北京学生占据了相对较多的好工种，显然是颇有微词。舍弟1970年进厂，也算“半元老”级，分得了一个好工种：“空调保全”，维护检修空调设备。“五·七”棉纺厂是按照我国援助非洲热带地区的厂房结构设计的，细纱车间与织布车间甚至都没有窗户，用空调来保持一定的温度和湿度，以利于纱线的韧度，不易断裂。为了节省中央空调的电力，也有意限制了厂房建筑的高度空间。但工人们在这种环境里工作，一进车间就感觉透不过气来，到处飞舞着纤细的棉花毛，空气污浊，戴上口罩也不舒服。数小时后脸上、鞋上、全身就落了一层棉毛，要用一块泡沫塑料仔细擦拭，才能将棉花毛除掉。因为没有窗户，电机和机器部件高速运转的轰鸣声和撞击声也无法传出去，噪音就在低矮的空间里来回撞击激荡，震耳欲聋。湖北本来就经常是阴雨连绵，工人们每天早出晚归，更是难见天日。加上伙食差，一个个都脸色惨白。从阳光灿烂的草原来到这样的工作生活环境，使我真切地感受到人对新鲜空气和阳光的需求；在这以前，这对我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问题。我不禁怀念起在草原放牧天天风吹日晒，肮脏不堪却时常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蹉跎岁月。

舍弟干了半年的“空调保全”，又被调去当管道工，也还可以。舍弟工作兢兢业业、勤恳好学，没有出过任何差错，还常常得到好评。没想到一年后，在没有任何解释和理由的情况下，又突然调他去锅炉房，三班倒烧锅炉！家母因此找了相识的机动车间主任，也无济于事。舍弟后来推测：机动车间刘主任刚刚将其外甥女（养女）从机动车间的技术工种调换到了更干净舒服的针织工场上班。为了堵住别人的嘴，就将其调去烧锅炉，以此作



为挡箭牌：北京的孩子也有当锅炉工的！其实就是柿子拿软的捏，欺负人。

我从进厂的第一年开始，就在夏季里做防暑降温工作。我对工作也是认真负责、任劳任怨。负责防暑降温工作的魏老师对我非常满意，每个夏天都把我从车间抽调出来协助她工作。到第四个夏天后食堂盖了新冷库，才把我正式从细纱车间调到食堂冷库开冷冻机，并承担全厂夏季的防暑降温工作，因为我在这方面已经是轻车熟路，可以给血压高的魏老师省不少心。哪一件事的促成，不是多方面的因素呢。

## 辛辛苦苦的纺织女工

纺织厂女工居多，一般都是运转班的一线挡车工，早中晚三班倒。细纱和织布车间的姑娘们每天都要在恶劣的车间环境里围绕着机器走五六十里路，不敢喝水或去厕所，很辛苦。记得著名的全国劳动模范、陕西“赵梦桃”小组的代表来厂里做报告传经送宝：“多吃馍，少喝汤，省得车间上茅房！”粗纱和准备车间的挡车工好一点。整理车间检验坯布，天天坐着不用巡回，只是费眼睛。女工最好的工种是实验室，干净，也有点技术含量。

男工最差的工种是上运转班的辅助工和壮工，毫无技术可言，文盲都可以极快胜任，因而地位底下，有自卑感。一般而言，上常白班的二线工人都算好工种。最好的是机动车间，车钳铣、电工、钣金、管道、电焊、木工等等。其次是各车间的设备维修工（纺织行业叫保全工）和上运转班的设备检修工。再其次是各车间里的辅助工段，比如皮辊、木管、修梭等等。起码可以在安安静静的环境里边干活边聊天，但技术含量很低。

如果能够混入三线科室，那就太舒服了。干干净净，没有一身的臭汗和油泥。所以纺织厂的澡堂是必备的，每天开放 10 个小时，以保证三班运转的工人能够在下班后洗澡、洗衣服。但在澡堂里丢东西（比如毛衣）是常有的事情。我在锡林郭勒草原插队时曾经三年没有洗过澡，来到安陆后，冬日里常常每天洗两次澡，下班后洗一次，临睡前再洗一次，暖暖和和入梦乡，不然咬着牙进冰窟一般的被窝太难受。

三线总务科后勤，炊事员、理发员都没人愿意干。幼儿园还可以，比车间里上运转班的挡车工强多了。细纱车间的一个女工因为皮肤过敏，调到总务科看澡堂，相对而言也算是个美差。厂医院的护士就太抢手了。厂里后来还办了子弟学校，可以上到高中毕业。“五·七”厂甚至还专门从北京买来了一套设备，每天轰隆隆的制作供应蜂窝煤。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 全国纺织战线学习的榜样

由于厂里的各级干部大多是北京来的工程技术管理人员，所以，从建厂之初就形成了一种尊重知识和技术，严格管理的厂风，这大概是那个年代所不多见的。1975年11月17日，厂里还放映过新闻纪录片《前进中的五七棉纺厂》。11月29日，传达了湖北省委关于学习“五·七”棉纺厂经验的第49号文件。

“五·七”棉纺厂之所以能够在七十年代成为全国纺织战线学习的榜样，也有着得天独厚的多重因素：（1）特殊的干部队伍，连工段长一级都是管理经验丰富的工程师，班组长最初有很多都是在文革中毕业的大学生。（2）由纺织部调拨厂里所需的计划物资，保证供应。（3）使用了援外的、国内最先进的整套棉纺织设备。并由工程技术人员对每一种设备的保全安装、保养维修制定了细致周密的工作法流程，精确到小时，用图表张贴公之于众。（4）制定了全面完善的岗位责任制，大张旗鼓地推行，所有的岗位都必须严格遵照执行。

由于全国各地的许多棉纺织企业都要陆续更新“五·七”厂率先采用的这一整套国内最先进的设备，他们就需要派人来学习操作运转以及安装维护这套设备的操作法和工作法。

“五·七”厂各大车间的操作运转和设备维修人员，也就在正常工作的同时，担负起培训全国棉纺织行业同行的任务。据我所见，数年当中，细纱车间接待了国内所有各省派来学习的同行。厂招待所因此常年住着操着全国各地口音的众多客人。

## 伴随了我们生活十几年的军代表

在那个荒唐的年代，军代表伴随了我们的生活十几年。最早接触军代表，是1967—1968年派驻北京各中学的军训团。除了学校一级，当时每个班级都有一名现役军人当排长。派到北京八十中的是北京军区空军部队，我们班的王排长是山西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后来在锡林郭勒草原下乡插队时，内蒙古自治区实行军管，派到锡林郭勒盟的是65军。军管对稳定当地的混乱局势的确起了很大作用，但这些人自恃“军管”的特殊地位，趾高气扬。西乌旗哈拉图公社的一个北京知青向军管组提了几个问题，结果被说成是“当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就是北京知青给军管出难题”，因此而挨整。派驻我们公社的军管组组长是一个小班长，带着几个战士。相当于营级的公社书记在他们面前都俯首帖耳、服服帖帖。这几个战士中有两个是石家庄老高的一中学生，一个老初三的农村兵，都是同龄人。只不过是他们当了兵，我们来插队了，结果处境竟然是天壤之别。这个小班长多次奸污女知青，面对家长的申诉控告，为了包庇部下，其上司、掌管数个公社军管组的杨排长，竟然在知青家长面前拔出手枪，将办公室桌上的玻璃板拍碎，大喊大叫，保证他的下属没有问题，以此来威胁恐吓或震慑。但这个小班长最终还是被五花大绑送交了军法审判。没有想到，离开了锡林郭勒草原，千里迢迢来到小小的安陆，又遇到了军代表！

大多数军代表虽不是坏人，但他们的极“左”和无知却有目共睹。海军派驻纺织工业部的军代表毛洪祥，曾多次到安陆“五·七”棉纺厂视察。一次在农场看到正在给窗户安装铁栏杆，不禁勃然大怒：你们这是在防备贫下中农吗？结果铁栏杆停止安装，为以后附近的农民入窗盗窃提供了方便，农具和储藏用品经常被洗劫一空。

针织工场的建筑设计方案是两层楼，由八根粗大的方柱贯通上下，一层是编织和漂染车间，其产品可用电梯送到二层的成衣车间加工。结果，厂房一层建筑刚刚完工，准备盖第二层时，毛代表来了。一看到厂房一层屋顶上耸立的八根方柱，毛代表就厉声斥责：你们这是在干什么？搞什么“高、大、洋、全”？结果工程被迫停止，成衣车间的设计施工

方案也被迫取消。编织和漂染车间正式投产后多年，车间房顶那八根大方柱还一直孤零零的耸立在那里，成为“五·七”棉纺厂一道奇特的景观。忘了是哪年才截断清除掉的。

编织和漂染车间位于“五·七”棉纺厂的东北角。成衣车间的设计施工被迫取消以后，厂里只得另选地段，隔着巨大的棉纺织主厂房，在厂里的东南角兴建了新的成衣车间。原来的设计方案是楼上楼下，电梯输送。现在却要专门雇佣几个民工，每天将编织和漂染车间的产品推到成衣车间加工。

早在1969年6月建厂之初，武汉驻军8228部队就向“五·七”棉纺厂派驻了五人军宣队，队长臧福义参加了厂筹备处领导小组。1971年6月，“五·七”棉纺厂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军代表王德全为革委会排名第一的副主任。

前面说过，根据纺织设备的运转周期，要进行“平车”（把机器拆开重装），分“小平车”和“大平车”：半年一“小平”，三年一“大平”。因此，每天都有一些机器设备处于“平车”的状态。“大平车”时连地脚螺丝都敲掉了，要重新用水泥封固。一次“大平车”往往需要7~10天才能做完。所以，“平车”肯定会影响到产量，但这是必须做的事情。王代表某日忽发奇想，给工程师出身的北京干部、织布车间主任打电话：能不能想个法子，使得织布机在“平车”的同时继续织布，不影响生产（也就是把织布机拆了，同时还能让它继续运转织布）？织布车间叶主任在电话中连连答应，说我们一定想方设法。放下电话，有人看见其嘴角露出了一丝不为人所觉察的轻蔑。

王代表大概是政工干部，喜欢作报告，针对厂里和青工中的问题，可以滔滔不绝地说两个多小时，大话、套话连篇，令人厌烦。他还多次带人搜查青工宿舍，看看有没有“黄色”书籍和违禁品，因此不得人心。在1974年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中，他被贴了一些大字报。有人捕风捉影，说他喜欢深入女工宿舍找人谈心，还有不雅动作。结果把他搞得灰溜溜的，后来就调走了。但军代表的家属都在厂里安排了工作，还分配了住房。不知这些军代表是哪年撤离的。■

## 【序与跋】

# “思痛”之华

## ——《云南文革笔记》读后

### 启之

每个人都是一部历史，每个人都有倾诉的愿望。但真正回顾历史的人少之又少。2010年《记忆》第55期刊登过一个“思痛文学主要中文书目”，连海内外的出版物及自印书全算上不过604本。尽管这是一个不完整的统计，但是，即便我们把这个数字扩大十倍，以文革发动时的六亿人为分母，愿意将往事诉之笔墨且付梓的，不足十万之一。

六年前，一位老革命的女儿将她写的回忆录给我看，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叙述，在最关键的地方，原来的女主人公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位陌生的女性，回忆录的人称也从“我”变成了“她”。我问作者这是怎么回事。她支吾了一阵才告诉我，那个陌生的“她”，其实就是原来的女主人公“我”。她之所以写得如此扑朔迷离，是因为她不愿意让儿女亲友知道她当年的经历。

她答应改写，可至今没有动笔。

三年前，我采访一位退休的司长，当年的右派。他给我看了他五年前写的回忆录。问他为什么不拿去出版。他很抱歉地吧达吧达嘴：“听说上边有个政策，在言论上，对八十岁以上的不追究，我还是等到八十岁以后再说吧。”他能否活到八十以后？就是活到了，又能否决心出版？就是下了决心，又能否通过审查？都是问号。

由此可知，能够写完回忆录，并让它问世的人，少之又少。

本书的作者周孜仁先生，就是这少之又少中的一个。

我读过周先生的《一个红卫兵小报主编的自述》，那本书写的是文革初的两年（1966至1968）；这本书写的是此后的八年（1968至1976）。这两本书记载了他的人生中最主要的经历，呈现了中国最变态的历史。我把这两本书都归为“思痛文学”。

“思痛文学”是我对这类文字的专称。“思痛”一词，源于韦君宜的《思痛录》，韦氏在其书的“缘起”中说：“‘四人帮’垮台之后，许多人痛定思痛，忍不住提起笔来，写自己遭冤的历史，也有写痛史的，也有写可笑的荒唐史的，也有以严肃姿态写历史的，也有从1957年开始的，也有从胡风案开始的，想压也压不住。”

“思痛文学”不同于人们熟知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它不是虚构性的文字，而是以回忆录和史传散文为主体的纪实文学。它坦露伤痕，但重在心灵的陈述；它致力反思，但比“反思文学”挖得更深，想得更远；它也寻根，但它寻找的不是虚无飘渺的文化，而是与现实密切相关的体制。

“思痛文学”是纪实的，它以真实为本，以文学为辅。在当代文学史上，这类纪实文学的兴盛，先后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五六十年代，《高玉宝》、《把一切献给党》、《我的一家》、《革命母亲夏娘娘》、《不死的王孝和》等革命者的自传或传记，《红旗飘飘》、《星火燎原》、《志愿军一日》等革命回忆录，感动、教育了无数人。这其中包括革命者的后代，也包括非革命者的后代。

第二次是八十年代后期至今的“思痛文学”，《上海生死劫》、《牛鬼蛇神录》、《九死一生：我的右派经历》，《思痛录》、《往事并不如烟》感动、教育了更多的人，包括革命者后代的后代，也包括革命者本人。

第一次纪实文学的创作，由国家机器组织作家生产，共青团中央等部门推荐、号召阅读，直到文革前夕才消歇。第二次纪实文学的创作，发自民间，由受难者和受害者自己撰写，大量作品只能通过海外、自印、互联网等渠道艰难问世。这一思痛文学之潮，从新时期至今三十多年，仍旧蓬勃，不见尽头。

这两次纪实文学都为历史、为后代留下了真实。不同的是，前者的真实是革命需要的流血和牺牲，后者的真实是革命造成的恐惧、苦难与毒害。尽管当代文学对此避而不谈，文学评论家对其讳莫如深。但是，我相信，“思痛文学”必将在未来的思想史与文学史中占有重要的一席。

大凡受苦受难，蒙冤负屈之人，都想把自己的遭遇呈之世人，告之子孙。但呈现的方式各有不同。前年我有幸结识了杭州作家田建模先生，一位在劳改营、监狱和流亡中度过了二十多个春秋的右派和“现反”。他穷十年之力，逞不羁之才，写就了长篇小说《史迹》。尽管我为此书写了书评，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还是为他选择的呈现方式可惜——《史迹》印不过百册，读者不超过百人。如果他弃小说而行回忆，远虚构而近纪实，以“思痛者”的身份写一“思痛文学”，他的读者将会大大增加。

周孜仁先生写过小说，八十年代初，他的处女作《三重奏》，曾被多家报刊转载，还上了《1980年全国优秀小说选》，被改编成广播剧，获了奖。其想象力和文学才华可见一斑。但是，被称为作家的他，没有虚构下去，而选择了“思痛者”的路。在他的文字面前，无论是非虚构性的“幸存者”文学，还是虚构性的“伤痕”文学都黯然失色。

“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是文革时流行的口号。“思痛者”就是“受蒙蔽”者，因此“思痛文学”既是“受蒙蔽”者上当受骗的文学，也是“受蒙蔽”者反思的文学。“思痛者”反思的是蒙蔽他们的歪理邪说，是让这些歪理邪说纵横天下的制度和文化的。在这个意义上讲，“思痛者”就是觉悟者，“思痛文学”就是启蒙文学。

我与周孜仁先生素昧平生。但读其书，知其人。我相信，他的《笔记》在“思痛文学”中将名列榜首。这不仅是因为他的文思，他的才情，更重要的是他对历史、对人性的省思、对自我、对内心的剖析。而正是这一点，赋予了这本书特立独行的性格，使之在当代文学云遮雾障之际，以真实为平台，以“史鉴”为职志。绍续五四的传统，在默默无闻之中开辟着“新启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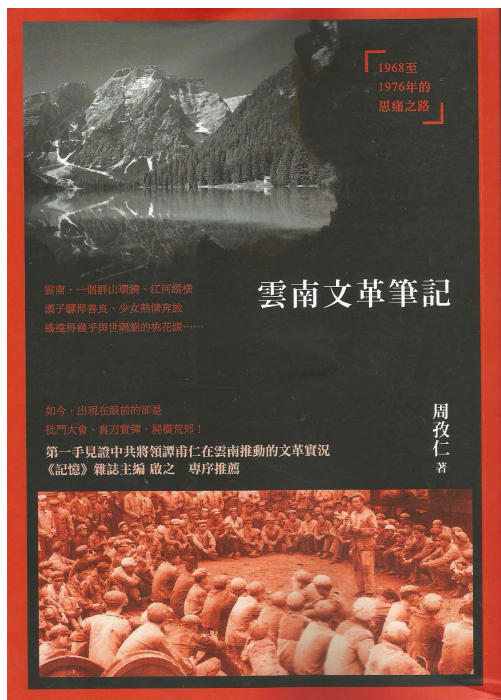
2011-9-16 初稿

2011-11-6 修改

## 【书讯】

## 周孜仁著《云南文革笔记》在台出版

韦陀



本书作者周孜仁，四川成都人，毕业于重庆大学电机系。文革中参加“重庆八一五派”，任《815战报》主编。曾所著时局评述《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一文，曾引起毛泽东的关注。被坊间斥为“全国五大毒草之一”。文革后期受到审查，被分配到云南边疆接受“再教育”。先后当过电工、省委秘书、反革命疑犯、技术员、高级工程师及公司经理。著有《一个红卫兵小报主编的文革记忆》、《风月回望录——红卫兵小报主编的家族追忆》等历史著作，及长篇小说《筑路喋血记》。

《云南文革笔记》是他的第三本著作。全书近四百页，分四卷，第一卷“在边疆”，讲述作者以改造之身，发配云南昆明。因文笔敏捷，留在省委秘书组。其间耳闻目睹了昆明的“政治瘟疫”、“二何事件”等多起荒唐年代的荒唐闹剧。第二卷“谭甫仁办公室”，讲述了昆明十一中风波，通海地震、匿名信事件、老红军的故事和谭甫仁被杀的惊天大案。第三卷“省委办公室”，记述了林彪事件带来的“余震”、文化大革命对边疆民族政策的大破坏等重大历史；第四卷“放逐”，讲述了当地花样百出的“批林批孔”运动，重庆的告密比赛和作者遭受隔离审查的情况。

此书2015年8月由台湾秀威公司出版，售新台币520元。■

【资料】



## 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全体革命职工向毛主席致敬电

(1967.01.10)

新华社上海九日电 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今天刊登了这两个报社的全体革命职工向毛主席致敬电。致敬电全文如下：

最最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获得新生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全体革命职工，向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致以最崇高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今晨，我们听到了《人民日报》转载一月五日《文汇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喜讯，并且读到了《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的极其重要的编者按。我们的心情万分激动，浑身热血沸腾。敬爱的毛主席，这是您老人家给我们的最大的关怀，最大的支持，最大的鼓舞，最大的鞭策。我们将以最大的革命热情，更高地举起以您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和上海市革命人民一起，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反击，办好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敬爱的毛主席，我们无限兴奋地向您汇报：在以您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上海地区革命力量越来越壮大，越来越成熟。特别是上海的工人运动，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上海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越来越好。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越来越孤立。他们的反动面目，已为更多的革命群众所识破。上海地区革命力量正在实现大联合、大团结，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抓革命，促生产，是您老人家所提出的并且一再强调的重大方针。令人气愤的是，上海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还在玩弄新的鬼花

招。他们以物质利益作为诱饵，腐蚀一部分工人的思想，妄图把群众引入经济主义的邪路，以此转移斗争的大方向，破坏生产，破坏国家财政金融，破坏文化大革命。但是，坚定的革命左派完全识破了他们的阴谋，坚决抵制经济福利的引诱，坚决击退“糖衣炮弹”的进攻。广大革命群众说得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破私立公，灭资兴无；我们就是要政治挂帅，坚决反对钞票挂帅；我们一定要坚持斗争的大方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敬爱的毛主席啊！千言万语，难以表达我们现在的激动心情。我们决心永远读您的书，听您的话，照您的指示办事，决心跟着您在大风大浪中前进，把自己锻炼成为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您的红色造反新闻战士！衷心地祝愿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

文汇报解放日报全体革命职工敬上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

**上海和外地在沪各革命造反团体欢庆中央贺电，  
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1967. 01. 13)**

新华社上海十二日电 上海和外地在沪各革命造反团体欢庆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全文如下：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

我们——永远忠于您的上海革命造反派全体战士，向您，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致以最崇高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当我们正在最最热烈地欢呼您老人家亲自决定向全国广播我们上海各革命群众组织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的时候，从北京又传来了您老人家的声音——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这是您老人家对我们的最大关怀，最大支持的声音，这是您老人家对我们的最大鼓舞、最大鞭策的声音。我们欢呼，我们歌唱，千万句话说不尽我们的幸福心情，千万支歌唱不完我们的感谢心情，我们只有千万遍跳跃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您总是在革命最关键的时刻，给我们指明斗争的大方向；您总是在斗争最尖锐的时刻，给我们带来了无穷的精神力量。您永远热情地关怀和支持革命造反派。您永远培育和扶植一切革命的新生事物。现在，您又在我们革命造反派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激战中间，批准了我们的大方向，肯定了我们的战斗任务，支持我们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团结一切革命力量，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您的这一伟大英明的决定，定将迅速点燃展开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的熊熊烈火。什么反革命的经济主义，什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者组织的新反扑，什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堡垒，都将统统在这场冲天烈火中烧焦、烧臭、烧成灰！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您一再教导我们，敌人决不会自行消灭，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事实正是这样。上海市委中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虽然他们玩弄的反革命的经济主义阴谋已经被揭穿，虽然他们已经在革命群众的重重包围之中开始全线崩溃，但他们仍然在进行疯狂挣扎，千方百计地企图瓦解我们上海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妄想在我们各革命造反团体中制造分裂，挑起纠纷，以便他们滑脚溜走，取得喘息时间，卷土重来。我们一定不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我们一定要

遵循您的教导，“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一致行动起来，穷追猛打落水狗，把他们打个落花流水，打得永世不能翻身。我们一定要坚决贯彻您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正确方针，彻底肃清反革命的经济主义的恶劣影响。我们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一定要在毛泽东思想的大旗下，把革命造反派进一步联合起来，把群众的大多数团结起来，紧紧掌握住上海文化大革命和生产的领导权，使上海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您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祝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上海和外地在沪各革命造反团体欢庆中央贺电，  
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 ■

## 【读者来信】

### 1. 漂木谈章铎文

这一期章铎的文章很全面，说明北大有的研究者是很用心的。在谈论北大文革的文章中，她和胡宗式是最诚恳，最认真的。

觉得一个具体单位，难以根据与中央某个大人物有保或打的关系，来判断是非曲直。关键是校内自己的问题。直至现在，我还不清楚北大的运动骨干们，为何会分裂出誓不两立的两派？■

### 2. 吴越谈《记忆》的首发

任何报刊都要求首发，《记忆》也不应该例外。但是贵刊近来连续发生非首发的事情。先是王海光的文章先发在网上，后发在《记忆》上。最近又有范世涛的文章（《八一六，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预演》）早于贵刊十天就刊登在“共识网”上。这种事情刚发生在王海光身上时，贵刊还向读者道歉。其实，贵刊要做的是两条，第一、明白当下办刊的处境；第二、拿出高人一头的办法。

在信息爆炸、诚信贬值的当今世界，任何刊物要想保住首发这块牌子，都得有高人一头的办法。要么，你动之以利——付给作者高稿酬。要么，你诱之以名——让人家在你的刊物发文，有一登龙门身价百倍的感觉。贵刊两条都沾不上，难矣！

不过，听说贵刊会定期将刊发过的文章选编入集，在海外出书，然后分赠作者。在出书难的当下，这个办法还是对作者有一定吸引力的。贵刊不妨给作者们订个规矩：唯《记忆》首发者都方可入选，非首发者绝不入集。或许，这是贵刊保住首发的唯一法宝了。不过，这个法宝也只是对那些想要书的人有效。■

### 3. 范世涛答吴越来信

谢谢吴越的来信。

实际上我昨天才发现共识网转发了《八一六：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预演》一文，来源注明是我的公号“食货读书”，转载时间是8月20日，阅读量已经超过一万。我这才想起来文章写完后，曾经发到共识网的导师群征求意见，使用的是公号预览版本。共识网的编辑误认为这是一个已经定稿的文章转载了。其实那篇公号文章至今还没有推送出来。

发现这一问题之后，我已经联系共识网编辑说明情况，表示文章正式发表于《记忆》杂志，版权也归他们所有。因为共识网编辑也是善意，我将自己的公号条形码放了上去，算是作者认可过。

我记得投稿《记忆》杂志这篇论文的时间似乎是5、6月份，7月份、8月上旬看文章还没有发表出来，所以又做过修改重新发送给《记忆》杂志。所以共识网实际上是征求意见稿，《记忆》杂志才是定稿。但不记得有哪些细节差别了。

不管怎么说，我自己在发送文章征求意见时出了岔子，应当检讨并力求避免出现类似情况。感谢读者指出这一点。■

### 4. 谢定国正误

《记忆》132期，北京大学文革专辑（三）刊登了我的《一个北大学子的文革日记》（署名：扬子浪）。这个日记的“前言”中有一个错误：“中国历史的长河或许真如黄仁宇所讲已经冲出了三峡“一句中的”黄仁宇“应为”唐德刚“。特此更正。■

## 版 权 声 明

《记忆》创刊于 2008 年 9 月 13 日，是一份研究中国当代历史的电子刊物。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版面设计、专栏目录与名称等内容，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

未经著作权人明确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发行、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举报邮箱：[dw66778899@163.com](mailto:dw66778899@163.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